

#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

@沙灣徑25號

##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

@沙灣徑25號

龍應台 著

所謂脫離殖民，原來是「殖民者」開始認真地尋找自己、認識自己、肯定自己、接受自己。每一次遊行，每一次辯論，每一次抗爭，都會使「我是什麼人」的困惑變得清晰。每一棟老屋被保存，每一株老樹被扶起，每一條老路被修護，都會使人們驚喜：原來我們腳所踩的就是我們的島，我們的家，我們的國。



## 內容簡介

…這一刻，龍應台彷彿五十多年前流亡南下的讀書人，香港彷彿亮着風燈的客棧：一壁爐火，半盞冷

酒，一頓粗飯，一床久違的溫暖，靜夜裏偶爾傳來的幾聲咳嗽，撩起的也許是江南故人多病的惦掛；天亮後幾個頑童喧鬧的爭吵，聯想的也許是臺北權力走廊上打碎酒杯的喟嘆。

終於，她決定寫一個《沙灣徑25號》的專欄，每星期先寫一篇，寫慣了會寫兩篇：思考中的獨白，山道上的啟示，藍海邊的頓悟，講堂裏的叮嚀。

根據龍應台在臺灣、上海和新加坡的「縱火業績」，若說她會在香港安靜沈默地度過兩年，誰都不會相信，但令香港讀者大開眼界的是，龍應台採取了一種「實在」的態度來對待香港。

她不只在抽象理念或宏觀回顧上打轉，幾乎每篇文章都是針對香港獨特而重要的公共議題提出批判或建言。龍應台敏銳地關注到香港人的許多關注，卻沒有忽略香港人的許多忽略，連珠砲發，不知道是貪玩抑或認真，她在香港的牆上銘寫了大大的「到此一遊」四字，字體之深刻，令誰都無法假裝看不見。

龍應台向香港人示範了外來學者可以、應該、如何以「知識批判」介入本土社會。

##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 - 人文關懷學者的叮嚀

很多人都說「香港故事很難說」！

也斯說：「每次說香港的故事，結果總變成關於別的地方的故事：每次說別的地方的故事，結果又總變成香港的故事…。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甚麼位置說話」，他叫大家繼續試說故事，用故事說出我們此時此地的感受。李照興繼承了這份情懷，在『愛恨香港的101個理由』中，編輯了一零一篇對香港喜惡的文章，強調眾聲喧嘩。但筆者時常想，喧嘩過後又如何呢？剩下些甚麼呢？香港故事是否只可喧嘩才可繼續下去呢？

呂/大/樂/說：「事實上，近年不少人嘗試為香港社會發展的歷做總結，所做的很大程度上只是對所謂「香港精神」不

同方面的描述；至於完整的整理…仍然欠奉」，他提出這問題是正值九/七回歸，所以他關心的是殖民地成功故事並不代表香港故事，而是「香港人追尋並參與建立一個較理想的社會環境的過程…現在我們所需的，是一種嶄新的視野——一種從香港人的角度和生活經驗來理解香港發展經驗的視野」，所以他寫下「唔該，埋單」，亦寫了「無關痛癢的一/九/七/四」。

呂/大/樂的提議，在九/七後得到正面回應，至零/三年沙/士及七/一遊行後，有越來越多的書籍出版，說它們的香港故事。有些是集中於政情的香港故事、有些是標榜廿歲尾卅歲頭的新生代故事、亦有些過往未曾出現，屬於香港低下層的一人一故事。

不過有時候，書看多了會不期然有種重重覆覆的感覺，特別當香港故事與香港可以往何處去一起說時，中國因素、香港教育素質、人民素質、政府施政效率、官

僚制度的僵化等，很多時候都會在文章中見到。而香港的未來發展，必不離全球化的（經濟）定位、中國經濟圈內定位等考慮，總是少了點甚麼似的。

看畢龍/應/台的新書，筆者就發覺原來有時候（當然並非全部）就是缺少了人文關懷的胸襟、筆觸及視野。龍應台這本新書，或許能為我們如何寫香港故事作出一些啟迪；原來，我們不單要說香港故事，她還告訴我們可以如何用人文關懷的方式令香港故事寫下去。

在第一部份：「香港你往那裏去？」龍/應/台籍著對公共政策議題的討論，向我們示範了如何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對香港作出叮嚀（雖然龍的文章中充滿著為香港斷症的角度，但與其視之為專業的問診，筆者覺得更似是母親對孩子的叮嚀）。

在幾篇文章「西九龍，請慢」、「香港，你往哪裏去？」、「誰的添馬艦」、「呼喚公民運動的開展」中，龍應台提醒

政府及我們在討論城市建設、在「將高樓大廈當作唯一的美麗，把發展當作單一的標準，讓商業綁架了文化，將現代化簡單地解釋」（p.43）的同時，應該思考一下我們希望未來香港的模樣，是「仍舊是亞洲的購物中心，？還是一個自主的「新香港文化」的誕生」（p. 16）。

龍/應/台亦透過不斷地問，讓我們重新發覺香港從來（亦會繼續）是不同人種的混雜，所以我們要的並不是甚麼樣的地標、甚麼樣的城市建築，而是要開始問香港甚麼人需要／想要甚麼設施？想有一個甚麼樣的香港文化？ 她所關懷的，未必是將來的香港會變成甚麼模樣，她更關心「溫順」的香港人，如何可以由現在開始有更廣泛、涉及更多人的公民參與、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及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p. 90）。

龍/應/台在本書中，亦向我們示範了「問」的方式及目光的終點可以放在那

裏。當董/建/華要建造數碼港、中藥港；許/仕/仁語重心長地警告香港，要避免邊緣化，問的是如何提高香港經濟競爭力。龍/應/台說的是文化權，問的是「甚麼使城市更可愛？」（p. 45）是「甚麼時候，你終於要開始跟人家比「內涵」呢」（p. 83）。當李/國/章要開始在中學推行通識教育，其關心的是如何能令香港學生有通識思變，以應付（勞動市場）全球化的挑戰；當香港各大學努力引入外地及國內精英學生時，想做的是為香港未來提供人材。龍應台由幾位曾在香港大學出現的人物，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等，呼籲港大拾回斷裂的人文傳統（「期待人文港大」一文）；她透過其兒子華飛的故事讓我們看見，通識教育可以是甚麼？應該關懷甚麼？（「香港老師問」一文），她會問「香港人真很有國際觀嗎？」「夾在殖/民情結和祖國情結中搖擺困惑的香港人，可不可能加一個宏觀的角度——把中國放在一個全球視野中去瞭解」（「為甚



麼燈泡不亮」一文）？她會從提香港人文精神、強調公民社會作為塑造未來香港文化的出發點。

筆者並不是想說「外國的月亮比較圓」，但或許是我們「愛之深、責之切」，以致我們熱切地批評政府，關心香港大型企業如何壟斷社會；又或許如筆者一樣，在一個陳冠中所言，重視自己的靈活性、關心如何最快地適應遊戲規則，拿到分數、重視效率、強調效益；或許是我們生活在這地方太久了，生活的煩俗、壓力逼得我們太緊了，令我們對很多事情都失去了好奇，所以人文關懷很少在我們思想當中滋生。以致我們不會從睇牙醫過程看到文明的扎根（「詠兒和慧兒」一文）；不曾享受香港的生活方式，就是幸福的代名詞（「幸福就……」一文）；筆者亦未曾發現原來香港市花是豔紫荊，而不是洋紫荊（「豔紫荊和島嶼身世」一文）。

馬家輝在封底寫到：「龍/應/台向香

港人示範了外來學者可以、應該、如何以『知識批判』介入本土社會。」（出自「龍/應/台如何在香港放火」，見在『廢墟中看見羅馬』一書，馬家輝著，天地出版社）

我認為還說得不夠仔細，因為龍/應/台在書中示範的，是以世界公民為身份，以人文關懷及跨文化敏感的經緯，進行望、聞、切、問，以一個母親的筆觸為「人文香港」作出叮嚀。

沙灣徑25號

龍應台 (20041022)

## 鄉野香港

沙灣徑的宿舍在山腰上，眺望中國南海。每天黃昏，夕陽準時和你在陽臺交會。只不過中秋過後，陽光一天比一天淡薄。到了陽曆十月，市場裡原來光溜溜的柚子看起來都皺了皮，太陽就落得更早。下午五點半，南海上方的太陽，因為霧色的煙嵐像水墨一樣暈開，太陽就像一隻剛剛剝開的蛋黃，油澄澄地一枚，懸浮在空中；用目測，感覺它離海面大約是兩株木麻黃的高度；「山海經」裡的木麻黃。

海面有細細的波紋，水光搖晃，像千千萬萬片透明的金屬薄片因風流動。陽光慷慨地刷亮一條水道，金金粉粉地蕩開來，先是銀樓裡那種黃金燦燦，然後變成一吹就破的淡得不能再淡的依依緋紅，讓你想起歐洲四月初開的蘋果花。在你出神的片刻，一艘船悠悠滑進了緋紅的光影中央。

中秋前常雨。雨未來，南海上先有演出。風怒起，濃黑的雲一層一層搭出厚厚幕布，天地陡暗。第一聲雷響的時候，你驚一下，趕緊將面東的窗戶一一緊閉，讓雨飄不進來。然後沖到陽臺入座，等候。熾熱的陽光其實還在雲後，風逼著卷雲忽東忽西，時開時闔，於是那毫不退讓的陽光，從濃雲不斷變幻的空隙中射向海面，像強光聚光跟蹤光照在一個黑暗而巨大空曠的舞臺上，一束一束、一條一條地交錯投擲，配以陣雷的交響，加上風的呼嘯，光，在深藏不漏的海面上忽明忽滅忽張狂。

你在幽暗的陽臺上，暴風吹亂頭髮，你凝神注視。

靜下來的時候，黑暗甜蜜地覆蓋著海洋，像一條冬天的厚被。有船在夜航，船身沒入黑暗，只露出幾星孤獨燈火，在空明中無聲滑行，像一場無可言喻的夢境。

從陽臺眺望海面，猶如從山上俯視深谷，一片空曠。空曠就是飛鳥的家。老

鷹，一定是香港真正的原住民。在香港任何一個點，不論是草木叢生的郊野公園或是人頭鑽動的中環鬧區，你只要站定，抬頭，靜心片刻，就會在山谷的天空裡或是大樓與大樓的空處，看見它，張著翅膀騎著風，俯瞰你。但是下面萬頭鑽動的人們，很少抬頭望向空曠。

老鷹從陽臺前和你擦身而過，近到讓你看見了牠蒼老的眼睛。你倒退一步，彷彿讓路給牠，心中有種不安：你站的地方，本應是屬於牠的山谷和森林啊。有時候，你看見牠落腳在對面的高樓頂端，像老僧靜坐，長久不動。風在吹，草葉在搖晃，海浪在翻起，光影在流逝，蛋黃似的夕陽在三十秒內沉下，你明明白白看見地球在轉。老鷹，仍舊靜坐。

喜鵲若是路過陽臺，你一眼就認出。牠長長的尾巴像一支柄做得太長的湯匙。或許嘴裡銜著人家忘在陽臺上的一枚戒指，牠在匆匆趕路，「刷」一下就竄進了樹叢。

若是經過一株瘦瘦的洋紫荊，聽見頭上不那麼悅耳的鳥聲嘈雜，你知道不可錯過，站定。枝桠裡是成群的雪鸚鵡。一身潔淨雪白，頭冠紫醉金迷，卻全沒氣質，在葉叢裡追逐打鬧。其中一隻突然開跑，一整群雪鸚鵡「倏」地一聲就沖上了天。

### 權作居停

沙灣徑不是「徑」，它是一條六米寬的車道，雙向行駛。但是你沿著它走，又有走在小徑上的感覺。它是一條盤在半山上的路，一邊是極陡的山坡，一邊是大海。在微雨後出去散步，可能在徑上遇見肥大的蚯蚓，被雨聲驚動了，和你一樣出來透氣。

有一條狹窄的石階，垂直切下，陡降百尺，兩旁是熱帶叢林。草本的野山芋大得像樹，攤開的葉子濃綠得出油。橡皮樹和巨榕無限擴張，彼此擁抱，又被爬藤像結網一樣緊緊纏住。含羞草放大成參天巨木的尺寸，就是合歡木。鬱鬱蒼蒼，草木奔發，不起眼的蔓藤從樹根底處細細攀爬，

重重環繞，爬到叢林綿密的頂冠，迎向陽光開出燦爛的喇叭花，炫耀一片盛氣凌人的紫藍。

雨，打松了土，土裡所有的樹根都在深呼吸，放出一股微微的濕潤的土香。這個島，曾經被多密多深的叢林所覆蓋啊，你思索，它究竟在哪裡？

北緯十六度，東經九度的交會點，北京二千公里以南，和巴哈馬、夏威夷、墨西哥市平行。二三五個島的聚集，一〇四二平方公里的土面積，五十平方公里的水面積，七三三公里綿延的海岸線。沙灣徑所在的這個島嶼，總共有七七．五平方公里大，縱走三十八公里，橫行五十公里，每一平方公里上住了一萬八千個人，是人類最擁擠的城市。所以視野所及，無處不是鋼筋水泥在山谷中突兀拔起；無處不是「人定勝天」的驕傲展示。整個島嶼就像是一個攀岩練習場，而每一棟高聳的建築都是結構工程師的畢業展覽，攀岩勝利者插在岩上宣佈佔領的旗幟。山坡上的熱帶

叢林用生猛的野氣在提醒：島嶼，本來屬於叢林。誰知道，人和叢林，誰是暫居的過客。

翻過一堵圍堤，到了沙灣。從陽臺上遠眺，這似乎是唯一可以讓人碰到海水的地方，現在站在灘上，才發現沙灣其實沒有沙，全是石礫，你穿著涼鞋，覺得石礫割腳，爬堤時還碰破了膝蓋的皮。

竟然有人在海中游泳——海面上任何一個時刻都有近百艘船在航行，排出的廢氣和油漬嚇不了這些人？一個人泅水上了岸，是位老者。他邊拭身邊說話：

在沙灣遊了五十年的泳，這是兒時和夥伴戲水的沙灘。從前啊，全是白沙，細細白沙，腳踩上去是軟的。所以這地方叫「沙灣」啊。政府開始填海之後，沙就不見了。水本來很清，看得見大魚翻身，現在髒啦，可是，來了五十年，還是日日來，總是在黃昏，看落日……捨不得走。我八十歲了……。

叢林濃密處，露出一段石階，生了厚厚



的青苔。你試探著拾階而上，蔓藤纏住頭髮，蛛網黏住了睫毛，林裡有檸檬的酸香蕩漾。石階殘破，到山溝即沒入土丘。山溝裡滿滿是白色的落花，抬頭看，是一株巨大的玉蘭，滿樹香花盛開，風吹時，花瓣紛紛撲落，掉了你一臉。

終於鑽出叢林，正要分辨東西南北回家之路，發現一座樸素的牌樓，「東華醫院義莊」，後面幾行俊秀的楷書：

「去年九月二日颶風肆虐義莊 屋瓦遍受摧殘 小徑牌樓 均為傾毀 不獨觀瞻所系 抑亦旅櫬難安妥 乃鳩工石材重新修葺 巍峨(王襄)麗恢復舊觀 茲已告成 略志其梗概如右」。落款是「中華民國廿七年」。

老樹森森，小徑幽然，再往深處行去，香花樹下有一副對聯：

向何處同參靜悟 也有離亭風笛 遠寺霜鐘  
到此間權作居停 半是金縠衣冠 玉樓粉黛

青煙往上繚繞，香花簌簌落下。一片寂靜。

##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沙灣徑25號

阿拉伯芥

龍應台 (20041203)

金門人淡淡地告訴你他是怎麼長大的。島上孩子都沒見過球，球是管制品，因為幾個籃球綁在一起就可以漂浮投共。晚上每個房子都成了轟炸目標，所以每扇窗戶就得用厚毯子遮起來，在裡頭悄悄說話，偷偷掌燈，四十年如一日。男人會告訴你，吃了四十年糙米之後，才知道糙米裡加了黃麴素，壓抑性衝動，避免軍人出事。女人會告訴你，那一年孩子突然得重病，要用軍機送到台灣治療，不是軍事任務還差點上不了飛機。

黃牛在麥田裡吃草，夜鷺穿過木麻黃林，金門人在砲火隆隆的天空下，在佈滿地雷的土地上，謹慎地戀愛，結婚，養育兒女。現在，觀光業者招徠遊客：金門好玩啊，來看那「生活不怕苦，工作不怕

難，戰鬥不怕死」的金門人。同時，台灣島上新一代的勇敢的領袖們開始大聲說話，你打我台北，我就打你上海；你丟一百個炸彈過來，我就丟一百個炸彈過去。語音未落，香港的報紙爭相報導：台灣人資金大量移向香港，半山的房子很多都讓台灣人買下了。

哪一個正常的人願意「生活不怕苦，工作不怕難，戰鬥不怕死」？哪一個正常的人願意放棄自己追求幸福的權利？哪一個正常的孩子不打球？

可是世上六十億人裡，沒有追求幸福的權利的，可能居大多數。如果你是個在板門店附近村子裡上學的小孩，你會聽老師說：來，做一個算數題。三十八度線的中立區那兒草木不生，每一平方公尺——大概一間小廁所的範圍，就埋了2.5顆地雷。中立區長兩百四十八公里，寬四公里，算算看總共有多少顆地雷？

如果你是個在中亞山區生長的孩子，你也無球可打。在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

坦、哈薩克、烏茲別克幾個國家交界的兩千五百平方公里荒涼而蒼老的大地裡，埋藏著三百萬枚待爆的地雷。勇敢的領袖們決定不打仗了，於是地雷就去炸死那赤腳荷鋤的農民，炸斷放學回家的孩子的腿，炸瞎那背著嬰兒到田裡送飯的母親。

為什麼不掃雷呢？對不起，沒錢。打仗的時候，領袖們以國家安全和民族主權的崇高理由把軍購費膨脹到極致，仗打完了，屍體還可以收拾乾淨，但是中了毒的大地無法復原；掃雷需要千萬上億的美金，而嬰兒，連奶粉都不夠啊。

全球有兩萬六千人因為誤觸地雷而死亡，大地裡還有一億一千萬枚地雷等著被「誤觸」。丹麥人於是「發明」了一種草，把常見的小草「阿拉伯芥」改動一下基因，這草就變成一種測雷器：阿拉伯芥的根，感覺到土裡頭地雷腐蝕後外洩出的二氧化氮，整株植物會從原來的綠色變成鐵紅色。阿拉伯芥的花粉經過處理之後，花粉也不會擴散繁殖。丹麥人打算在斯里

蘭卡、波士尼亞這些飽受摧殘的土地上實驗種植。

種下兩千五百平方公里面積的阿拉伯芥？然後看著美麗青翠的小草一塊一塊從綠轉紅？阿拉伯芥的命運，不也正是金門人、板門店人、阿富汗人的共同命運？我覺得發冷——人對自然、對生命過度地暴虐、褻瀆之後，他究竟還有什麼依靠呢？如果勇敢領袖們的心裡深埋著仇恨和野心的地雷，敏感的阿拉伯芥又救得了幾個我們疼愛的孩子呢？

沙灣徑25號

一石千浪，還是水靜流深

龍應台 (20041217)

副刊的轉型，可能不是退居邊緣就完了，而是如何把邊緣當作一個新的戰鬥位置，重新出發。

從報紙副刊可以看出一個社會的文化體質。在政治壓抑，新聞管制的環境裡，人心的鬱積沒有去處，副刊就成為一個表面平靜、暗潮洶湧的地方。或者是欲言又止的報導文學，或者是拐彎抹角的雜文，或者是借古諷今的歷史評論，每一個字都可能有言外之意，每一行空白都可能有弦外之音。寫的人意有所指，讀的人心領神會。一個社會，本來可以有千種溝通的方式：新聞的報導、時事的評論、議員的質詢、司法機關的調查、心理醫師的輔導、社福機構的協助、警察的主持正義...但是當這些管道堵塞的時候，文學的載重就擴大了，被賦予強大的社會功能。文學性的文字提供了一組密碼，作為社會溝通的另類語言，這種語言，外人看不懂。

在這樣的狀態裡，一石，可以激起千層巨浪。在壓抑中求存的人們渴求解放的聲音，一個作者只要抓到了時代的動脈，又有一點特別的激情和文字的魅力，很容易就成為英雄。而那管制的一方，為了維

護自己的權力，往往出手打擊，使得英雄的聲勢反而更高。在渴望英雄的時代裡，英雄也容易產生。知識份子在這樣的社會裡，雖然因壓抑而痛苦，可是也因壓抑而往往自我感覺特別重要。極權是惡龍，人民是美女，知識份子就是那手裡拿劍、騎白馬而來的王子，副刊是白馬馳騁的沙場。二十年前的台灣，副刊曾經是萬人矚目的焦點。今天的中國大陸，文化版及副刊的「沙場」雖然有限，但仍舊是疼痛的神經中樞，仍舊是一石可以激起千浪、英雄隨時可以躍起的地方。

香港報紙的副刊與大陸和台灣是一個很不一樣的生態。殖民地的教育與文化導向使副刊從來就不曾是影響社會的「中心」、產生英雄的「沙場」；它是真正的「副」刊，陪襯著英文的主流媒體。回歸七年以後，最近的香港，卻儼然正在進入一個「呼喚公民運動開展」的時代，公民力量有風起雲湧之勢，副刊成為公民意識的花圃。是否真開得出花來，沒人知道，

但是土壤，和種子，都鋪好了，只待和暖的天氣。

解嚴之後，台灣的副刊卸下了原先被膨脹的會責任：揭醜，有新聞記者；為民喉舌，有民意代表；伸冤，有司法機關；扶弱，有社福機構。。。人民自己的聲音凶猛多樣到一個地步，知識份子四顧茫然，一時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眾聲喧嘩裡，英雄的時代過去了，知識份子和副刊，退到一個安靜的角落，變成多元社會的一元。這時候，比的不再是激情和魅力，更多的卻是專業：影評藝評樂評書評需要專業，批評政府的文化或環保或經濟或國防外交政策需要專業，批評城市規劃和建築美學需要專業，批評政治管理需要專業。副刊，隨著社會的開放多元，也從一石千浪轉化為靜水流深。

不，不那麼美好，因為當政治強權撤走的時候，商業強權取而代之。當價值多元平頭出現的時候，劣幣又往往驅逐良幣，功利短視掩蓋長遠的視野。知識份子



退到邊緣，本是好事，因為「美人」獨立自主才是現代「白馬王子」追求的理想，但是沒有一個社會不需要前瞻者、預言家和行動家，沒有一個社會的改革不需要激情和魅力。回歸專業，並不意味著知識份子的全盤「工匠化」，而是說，知識份子如何在厚實的專業基礎上，不放棄激情和魅力，為社會前瞻，預言，行動。副刊的轉型，可能不是退居邊緣就完了，而是如何把邊緣當作一個新的戰鬥位置，重新出發。

一石千浪轉為靜水流深，不容易。

■沙灣徑25號

黑色玻璃罩

龍應台 (20050114)

在香港住得愈久，愈是能體會什麼叫作

「有自由，但沒有民主」。

經濟上，香港的自由世界第一。自由港的傳統允許全面的貿易自由，進出口一般商品不收關稅。企業經營完全自主，市場自動調節供需，政府不加干涉。沒有外匯管制，外匯、黃金，在這裡自由地進進出出。金融市場完全開放，本地銀行和外國銀行平等競爭；只要合法開業，任何銀行可以在這裡從事任何境內境外的金融活動。

貨品、外匯、黃金以及人員的自由進出，造就了香港的繁榮。自由港的多元、開放，政府的「不干預」經濟政策，也使得外人對香港的「自由」印象深刻。自由，很理所當然地，就被解釋為：政府很小，民間很大。

帶著這種過度簡單的對「自由」的想像，來到香港住下來，東看看西看看；沒幾個月，大大吃了一驚。我看見的，是另一個香港：民間很小，政府很大。

譬如說，我看見一個地方叫「數碼

港」，在港島美麗的海邊，名稱叫「數碼」，想必是個為發展數碼科技而開發的科學園區。但是與科技有關的辦公大樓只有一小塊，房地產建築卻是一大塊，而且地產買賣的廣告巨大無比，看房子的買客絡繹不絕，數碼大樓那兒卻空蕩蕩的，鳥兒飛到地面來搶啄掉下的麵包屑。怎麼回事？

香港人一臉的無可奈何，原來政府口口聲聲說這塊地大部分是科技用地，沒想到卻把大部分批給了一名特定商人，變成那個商人的昂貴地產。當然一切都看起來合法，我就笨笨地追問：奇怪啊，那麼記者怎麼不去做跟蹤調查報導？政府的監察系統為什麼不去查明責任？議員為什麼不去調出所有的財務報表，為什麼不要求檢閱所有的合約內容？你有太多團體可以監督政府啊。

每個香港人都給一個不同的答案，但是所有不同的答案其實最後又都匯到一個答案：要不到內部資料，政府不給就是不

給。

我覺得納悶：哪有那麼強大的政府啊，又不是共產黨？

然後又發現九龍海邊有塊空地，「填海多出來的，」香港人說。四十公頃地，最燦爛的海景。政府已經決定要在那裡建四座博物館、三座表演廳，然後用一個大得不能再大的棚子將全部罩起來。咦，我說，政府又怎麼知道香港需要四座博物館，三座表演廳？政府又憑什麼敢決定建一個大到不知如何修理、不知要花多少錢維護的巨無霸大屋簷？政府怎麼知道那麼多，敢做那麼多啊？

香港人一臉的無可奈何，說，我也不知道。

然後就是馬英九事件了。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邀請馬英九來演講，港府發給他的兩個幕僚簽證，但不給馬英九簽證，整個華人世界為之譁然。新聞事件通常只有一兩天熱度，第三天就像髒的洗碗水一樣咕嚕旋轉著消失在水槽出口，但馬英九

的消息鬧到第八天，還繼續發酵。媒體對港府的抨擊持續猛烈。

同樣的事情在台灣，馬英九或陳水扁會被媒體「堵」到不行。人們會不斷地看見市長或總統在電視螢幕上，被成堆的麥克風粗魯地壓近臉龐，尷尬地或不情願地，被迫對媒體做出解釋，對人民做出親口的、不容閃避的「交代」。政府部門在議會或國會的壓力下，早就將通話紀錄或者證件影本交出，供民意代表檢驗政府官員是否說謊。決策過程早就在媒體和議會的「審問」下，一個一個環節曝光。

但是在香港，到了第八天，所有的問題：究竟決策是誰在做？不發簽證的理由為何？決策過程是什麼？「一國兩制」怎麼「圓」這個事件？港台關係如何走下一步？已造成的傷害如何補救？……政府到第八天仍不做任何解釋。董建華，沒有一次被記者「堵」到，沒有一次發言，沒有一個字的「交代」。整個社會，在猜測、猜測、猜測。沒有人敢去質問特首，特首

也不覺任何壓力。好像有一個黑色的玻璃罩，牢牢地罩著政府，外面的人民踮起腳尖拚命想看見裡面，焦急而不安；裡面的官員就是不出來，安穩、傲慢、篤定。

於是我發現，自由與民主，差別就在這裡：沒有民主的自由，或許美好，但是政府賜予的，他可以給你，也可以不給你。

沙灣徑25號

一個警察的背後

龍應台 (20050128)

本來想悄悄去廣州，不驚動任何朋友，可以自由而且專心地，用行腳去感受廣州的老城氛圍。沒有想到，一個不小心，反倒變成一個華人世界舉世皆知的事件。幾天來，溫暖的關心電話和郵件從美國、歐洲、馬來西亞、香港、台灣、中國各個城市包括新疆和蒙古，不斷進來，倒叫我覺

得慚愧，但又不能因此希望自己「傷」得更重，以擔得起朋友和讀者的愛惜。

我開始回想那個關鍵的時刻：單身女子，背著背包，背包在後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攤開地圖。

這是一個國際「傻根」形象。那個街口不必是在廣州老城，也可以是羅馬噴泉，莫斯科紅場，華沙廣場，法蘭克福火車站大道。以那樣大方不設防的架勢，往任何一個城市中心一站，對於那個城市裡活躍於灰色空間的人而言，怎麼說都是一種挑釁或邀請。所以我的遭竊絕不足以被解釋為「中國特色」。

但它是不是「廣州特色」呢？

事情發生了之後，集體的「口述歷史」就打開了。一桌五個廣州市民，四個人有被偷被搶的經驗，而且每一個人都是多次，先講親身經歷：被摩托車撞，被小刀割，人怎麼欺身而上，怎麼搶了就跑……然後再敘述發生在親友身上的：兩歲的女子的媽，護著包，以致於整隻手被砍斷。

愈講，恐怖的細節愈多，我聽得兩眼發直，開始覺得：自己真是個好命的人啊，可喜可賀。

回到香港，香港人說，唉呀唉呀，你怎麼會想到一個人跑去廣州？廣州啊，我們男人都要成群結隊才敢去的。香港的大陸人說，怎麼你還沒學到呢？在這邊，背包背在後面，一過邊境，背包要背在前面。

我一邊奔波於銀行和移民局之間，一面讀到廣州官員的反應。省政協委員以「龍應台遭竊」案詢問廣東省公安廳長梁國聚對於治安有何對策，梁國聚說，廣東一億多人口，只有十三萬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問題。

公安廳長的談話倒是坦率，於是我開始算，照廳長這麼說，在廣東省，每一個警察要服務846個市民。臺北總共有7702個警察，也就是每一個警察要照顧341個臺北人，而香港有32986個警察，一個警察服務207個港人。柏林的一個警察只要管好130個柏林人的安全。如果算工資，香



港的警察工資會是廣東和臺北警察的好幾倍。

以這樣的制度和物質條件來看，梁國聚的自我辯護不算錯。香港警察的效率和牠背後的制度之間，不論是管理結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有一個明確的因果關係。知道了這個數據，對中國警察便不忍苛責，可是，這是現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譬如說，那846個人是否真正得到一個警察的服務？雖然警力微薄，警察的辦案效率，服務品質，以及廉潔程度，和臺北、香港的警察比起來如何？警察背後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體社會問題的連結與呼應，又如何？

我收到很多大陸讀者的來信，譬如這一封：

看到您被竊的新聞，身為大陸人除了感到丟人和羞恥、向您表示歉意和慰問。

其實，您遭遇的是許多大陸中國人都遭遇過的事。自從我父親在公交車上被偷（他帶著錢去醫院開白內障，交費時才發

現醫療費全沒了），我乘車時，總是睜大雙眼，隨時戒備，一分鐘也不敢放鬆。我知道您不喜歡做「貴賓」，可是要做一個普通的大陸人，必須小心！記住這裏是中國大陸，不是香港，不是臺灣，更不是德國！只要腐敗依然存在，只要貧富分化還在加距，只要體制不變，一切仍將繼續。

那樣溫柔敦厚的一封信，而同時又把問題看得那樣冷透，令人不安。

## 我就這樣認識了廣州

我幾乎是踩著雲霧走回酒店的，心裡想的是：台灣護照、台胞證、香港出入境許可、香港身分證、台灣身分證、德國出入境許可、德國和台灣駕照、不同銀行的信用卡……都沒有了。而且，我身無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過無數國界和邊境的人，馬上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我是一個失去了身分證明的人。

要是哪一個朋友在此刻出現，我一定抱頭痛哭給他看……

1.巨大的「拆」字 像秘密判決，噴在牆頭

你到過廣州嗎？

這麼簡單的問題，卻很難回答。是的，我來過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為「工作」而來，譬如演講。有人到車站或機場迎接，有備好的車子護送，有既定的路線畫好。進入一個講堂，離開一個講堂；進入一個酒店，離開一個酒店；熱情的人們和你說話，然後回到車站或機場，離開了這個城市。

稍微多幾個小時，可能會被帶到重要的景點，身負「導遊」任務的朋友努力地將兩千年或兩百年的歷史在二十分鐘內講完，然後在彼此都覺得意猶未盡、萬分遺憾的時候，一面說「下次再來」一面趕往機場或車站。

為了求效率，車子永遠走在高架橋或高速路上，而古老的中國為了急切地與國際

接軌，總是採取最劇烈的開刀方式，對準老城區一刀切下，開腸破肚。於是走在城市內的交通動脈上，望出車窗，看見的，多半是削了一半的紅磚老樓，拆得殘垣斷壁的庭院，半截橫樑，幾根危柱，滿地狼籍，有如未清理過的帶血跡的手術現場，巨大的「拆」字像秘密判決一樣，噴在牆頭。

有的城市，我會暗暗決定，再也不回來。有的，那二十分鐘的敘述留下幾個難忘的片段，記在心裡，還想探索，或者，在快速駛過的手術現場，瞥見一點點「手術前」的滄桑的美貌：一條樹影幽深的巷子，一排姿態嫵媚的老樓，半邊隱約的飛簷塔影，一個長滿青苔水藻的斑駁碼頭。吉光片羽略過，但是心裡知道；我要回頭，要單獨地、專注地回頭來認識這個城市。

廣州，就在這個必須「回頭」的名單上。

## 2.玻璃內與玻璃外之間

一月二十一日早上，看看窗外的天，灰灰的，感覺沉靜，是個「出走」的好天。對一個持台灣護照的人而言，隨興「出走」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為隨便在地球儀上挑出一個城市來，多半需要辦簽證，這一個念頭，足以冷卻掉任何想「出走」的衝動。

拿好台胞證，「出走」第一站是灣仔的中國旅行社，辦簽證。

第一次辦的時候，別人只需要等個十分鐘，我卻足足等了半個多小時。去問那坐在櫃台裡的小姐怎麼回事，她斜斜地睨著我，似笑非笑地說，「那你當然要等囉，你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嗎？」她的坦白讓我吃了一驚。

每次來都要等得比別人長，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見我來，還說「請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樣子。坐下來，透過玻璃看著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靜；但是在玻璃內與玻璃外之間，隱藏著一個深不可測的巨大空間，深得聽不見一點回音。

3.魯迅在廣州開書店。郁達夫在廣州飲茶……

火車緩緩開動，一個半小時的車程，足夠溫習一下自己對廣州的零碎印象：南越王趙陀在廣州建宮殿。蘇東坡在廣州欣賞寺廟。洪秀全在廣州拜上帝。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課。梁啟超在廣州寫文章。七十二烈士在廣州起義。孫中山在廣州開會。蔣介石在廣州練軍。陳寅恪在廣州寫《柳如是別傳》。魯迅在廣州開書店。郁達夫在廣州飲茶……。

一番胡思亂想，火車快進東站，才開始翻開手邊的旅遊小冊：

光孝寺：唐儀鳳元年（六七六年），禪宗六祖慧能在此受戒，開創佛教禪宗南宗之先河。

我嚇一跳：十五年的深藏，風動幡動的哲學辯論，菩提樹下的剃度，竟是在廣州嗎？為何在歷次的廣州行中，無人提及？再看下一則：

華林寺：梁武帝大通八年（五三四

年），西竺高僧達摩乘舟至廣州，在此登岸，並建茅舍。

只有短短兩行字，卻重如千鈞，我心跳得厲害。曾經在西安碑林看明朝風顛和尚畫的〈達摩東渡圖〉，也約略記得《祖堂集》（九五二年）裡敘述的梁武帝和達摩對話的機鋒：

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聯者誰？師曰：不識。又問：朕自登九五已來，度人、造寺、寫經、造像，有何功德？師曰：無功德。

.....

菩提達摩與政治人物話不投機，北上黃河，面壁九年，然後有慧可的「斷臂立雪」的傳奇。《楞伽師資記》裡慧可的話曾經令我徹夜清醒，難以入睡：

吾本發心時，截一臂，從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覺雪過於膝，以求無上道。

原來達摩一輩渡江，禪宗初始之處，也在廣州，為何無人告我？

旅客都走光了，光孝寺，華林寺，我邊

唸著名字，邊提起背包跌跌撞撞下車，踏進廣州，已是暮色沉沉。

#### 4.一個失去了身分證明的人

早晨的珠江帶點霧意，好像那江水還沒醒過來。我放棄早餐，背起背包奔出愛群酒店。站在長堤大馬路斑馬線上，車輛不讓人，根本過不了街。轉身將背包裡的地圖取出，決定了路線：江在南，寺在北。先去十三行看老建築群，再回頭沿海珠路往北走。

過了馬路，將地圖放回背包，發現背包的拉鍊大大地打開，裡面是空的。我停下腳步，看看周邊的人，一個乞討的孩子，三個發廣告傳單的青年，藥店前倚著閒閒的店員，幾個過路的男女。這是一個城市的街景，看起來，什麼都沒發生。

我幾乎是踩著雲霧走回酒店的，心裡想的是：台灣護照、台胞證、香港出入境許可、香港身分證、台灣身分證、德國出入境許可、德國和台灣駕照、不同銀行的信用卡……都沒有了。而且，我身無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過無數國界和邊境的人，馬上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我是一個失去了身分證明的人。

要是哪一個朋友在此刻出現，我一定抱頭痛哭給他看。

兩個基層警員倒是五分鐘之內就來到酒店，但是到了派出所，一個警員卻花了九十分鐘的時間做筆錄。筆錄，其實只有那三百來個字，抄下我已經寫下的失竊項目。我以為他會立即「辦案」，譬如說，管區警員可能熟悉那一區的竊盜集團，會試圖聯繫；譬如說，路口和酒店都裝了監視電視，馬上把出事時段的錄影帶調出來檢視；譬如說，詢問酒店的工作人員，追查線索……

九十分鐘過去了，我才發覺，警察唯一做的，是寫好筆錄，發給我一張報案失竊證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處申請臨時台胞證。其他的，都別想了。

上午十一點，到了出入境管理處。空空的大樓，這是星期六。一個穿警察制服的

人坐在一個電話機旁。窗子開著，冷風呼呼吹進來，他看起來凍得發抖。

顯然只是個接電話的人，值班的官員不在。他撥通了值班官員的電話，然後將話筒交給我，我開始解釋自己的困境：證件全沒了，明天必須回到香港，請問怎麼處理？

「今天是星期六，沒人上班。辦你這個，要好幾個部門的人，禮拜一再來。」

「對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

電話裡的人很惱火，打斷我，「你告訴我為什麼明天要回去？」

我愣住了。他相當憤怒地說，「你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給我說出來。」

我想說，您沒有權利要求我告訴您我為什麼一定得回去，這屬於一個公民的個人隱私；我想說，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政府是有義務為它的公民和訪客解決急難的；我想說，在一個法治的政府裡，所謂

值班，就是您無論如何不能離開這個位子；我想說，您能不能不用這種惡劣的口氣和我說話……

我都沒說，只是問他，「您不是值班嗎？」

「我沒要你跟我說話，」他說，「告訴你，我這是在為你服務，你搞清楚。……你說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決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學有事。」

電話突然掛掉了。

那凍得手背發白的人問，「他說什麼？馬上來嗎？」

我搖頭，「不知道啊。他掛了電話。」

「喔——」他想了想，「那我幫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聽了一會兒，放下聽筒，說，「他去找人。要你等著。」

「嘎？是等十分鐘？還是一小時？還是三小時？還是……？」

他似乎也很為難，然後再度勇敢地拿起

話筒，「她問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講定一個時間？」

放下話筒，他說，「他也不知道，因為他要去找其他部門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找得到人。」

看著他在冷風裡瑟縮的樣子，我說，「您實在應該穿著大衣坐在這裡，這兒太冷了。」他搖搖頭，說沒關係。

然後又拿起話筒，「小姐問能不能約個時間？」

聽了一會兒，他高興地說，「他會派一個人下來這裡收件，然後你下午四點再來取臨時台胞證。」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來收件，」我說，「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鐘以後，下來了一個小姑娘，來

「收件」。

下午四點，準時回到大樓，還得等。極寬闊空盪的大廳，沒有一張椅子。送來稿費救急的朋友問警衛，樓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衛懶得理，搖手表示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我走過去把警衛的椅子搬過來，有點生氣地對他說，「那麻煩您去搬幾張椅子過來讓我們坐著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洩氣地坐下。我幹嘛為難他？他不會知道，政府部門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大廳裡理所當然應該有椅子給市民坐。沒有椅子，他應該覺得抱歉。他的工資，都是市民繳的稅所發的。可是，如果他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的長官們，都沒有這種意識，你要求他什麼呢？

四點二十分，有人出現了，拿著一本新的台胞證。「要收費，七十元。」

朋友從口袋裡掏出錢鈔她說，「不行啊，我不能收錢。得負責收錢的人來開收

據收錢。」

「那——收錢的人在哪裡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搶下她手裡的證件就跑。

5.我不需要證明 我是真的我

有了台胞證，可以離開中國，但是不代表可以進入香港。

上了從廣州開往九龍的直通車。到了關卡，直接找香港海關的官員，解釋了狀況。他將我帶進一個辦公室，指著一張椅子，說，「請坐。」

這是星期天晚上八點半。另外幾個顯然也是入境手續有問題的人，正坐在一張長凳上等候，其中一個是非洲喀麥隆人，穿著拖鞋，露出所有的趾頭。

六個制服齊整的邊境官員正在忙碌。他們工作的神情專注，和同僚說話時，又顯得輕鬆愉快。一個女性官員甚至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桌子時，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輕俏腳步。

不耐久坐，我不時站起來走動。麻煩的

是，埋頭公文的公務員一抬頭，只要看見我站著，就會指著椅子，說，「你請坐啊。」

填表格，按指模，簽名。在九點半，我以一個准許我逗留七天的臨時入境許可進入香港。

第二天，第一站到了台北駐香港的代表處，它的名字帶著歷史的荒謬性：中華旅行社。在台北申請護照，只要二十四小時；在香港，因為郵件的來往，最長需要二十天。台北辦事處的官員熱情而迅速，但是，我恐怕享受了人們因為熟悉我而給予我的特別的信任；我不需要證明我是真的我。

下午一點半，到了香港入境處。抽了一個號碼，等候四十五分鐘，和官員面對面。

「辦理香港身分證，你需要香港入境證。」

「但是我的人境證被偷了。」

「那你就要辦理入境證。辦理入境證，

需要台灣護照。」

「但是我的台灣護照被偷了。」

「那你可以去律師那裡公證，證明你的身分。律師給你一個公證身分，我們也可以給你入境證。」

我看著這位講話規規矩矩的女性公務員，說，「沒有身分證，沒有護照，請問，律師憑什麼給我證明身分？」

她呆住了。我拿出當天的《蘋果日報》，大半版是龍應台失竊的消息，照片很大，還有「出事」地點的示意圖，看起來特別怵目驚心。

將報紙推進窗口，我說，「律師總不能憑《蘋果日報》來證明我是真的吧？」

她喃喃地說，「對啊……」

這時，她的長官發現了我們的僵局，走過來，微笑著點點頭，說，「我知道你的特殊狀況，我們會特別處理，一定會幫你解決的——」

6.廣州老城，有著法國印象派油畫的濃稠美感



我決定不被小偷打敗。

廣州的老城區竟然還處處看得見歷史的年輪，洋溢著老城的情趣。大德路幾個街廓全是五金業。鋼管以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掛在牆板上，乍看之下像現代藝術。小鋼圈成千上百地放在一堆時，彷彿貴族的珠寶箱子被不經意地打翻了。詩書路上看不見任何詩書，但是再走一段就發現整條街都是印刷業，也明白了「紙行街」的意思。接近十三行的成衣批發集中區，楊巷路一家連著一家的鈕釦店、拉鍊店、皮帶店、花邊店。當一整個店裡都是拉鍊的時候，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拉鍊，鋪排開來，簡直就像一個現代美術館的主題特展。

夾著老街的是一株一株菩提樹，菩提樹掩映著一棟一棟的老樓。老樓或沒落褪色或殘敗頹廢，但是雕花的廊柱、起伏的山牆、彩色的玻璃，彼此暗暗輝映，老舊中反而更有一種成熟的滄桑的嫵媚。

廣州老城，有著法國印象派油畫的濃稠

美感。

然後就走到了光孝寺。天色漸漸暗下來，大殿裡亮起盈盈燈火，晚課的誦經聲，在鐘聲、鼓聲的節奏下，綿綿流進靜謐的庭院。慧能受戒的菩提樹，不知是不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那一株，菩提樹的心形闊葉在風裡搖晃，一兩片隨風飄下，落在蒼青色的石階上。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我就這樣認識了廣州。

【2005/01/28 聯合報】

## 香港老師問

到香港教育學院去「答學生問」。答應去，是因為，教育學院是培養小學和初中老師的地方。在我心目中，小學、初中教育是重大「國家基礎建設」：創造力和

想像力在這裡破土，公民素養在這裡奠基，文化的敏感、人格的力量在這裡打樁——誰，比這些教師更站在前線、更接近地基、更值得愛護、更重要呢？

臨走時，帶了厚厚一把不及回應的提問紙，回家壓在咖啡杯下。海風獵獵吹進客廳，把兩張紙掀到了地板上，我彎腰拾起。既然風要我讀，遂去讀它。

您的文章中好像有一個觀點：我們不一定要認同自己的國家，更不一定要認同自己的政權。那麼在中小學裡的「國民教育」的課，我們該教些什麼呢？或者說，究竟需不需要「國民教育」這種東西？——一個中學老師

對於自己的祖國，我常覺得很迷惘。一方面我知道我要愛國，另一方面，一想到我的國家有很多黑暗面時，我就會有一種恨意。我想問：當學生問起「文革」、「六四」的時候，我該怎麼回答？——一個馬上要當老師的人

教皇人選公布那天，我特別等著華飛

放學回家，心裡想，當這初中三年級的學生聽見新教皇是他的德國同胞時，不知會有什麼反應。他會不會像贏了足球世界杯一樣，感覺一種民族的驕傲？

「真的？德國人？」他說，把書包丟在沙發上，一邊擦汗，「好失望啊。」

他一點沒有欣喜的樣子。

一邊吃午飯，少年一邊解釋自己的想法：幾百幾百年，教皇選來選去都是羅馬人，或者是中歐人，想法都很中歐中心。二十六年前，波蘭的主教被選上教皇，代表的是天主教的一種突破，一種進步。今天如果是一個黑人或是拉丁美洲人被選上的話，就表示這個突破和進步的力量往前又跨了一大步，代表天主教有新思維，新魄力。

「我很希望那個拉丁美洲的主教當選，黑人更好，還有，香港的主教也不錯呀，」他說，「幹嘛選個德國人，而且還是個保守派！真退步。」

「華飛，」我問他，「你們的老師也

是這樣的態度嗎？」

「對，」他說，「在宗教課或是公民課裡，我們討論很多啊。」

那是一個月前的事了。今天下午，我在陽台上澆花，華飛坐在電腦前上網，時不時向我「播報新聞」：烏茲別克有五百人被殺，政府說只死了十個人。日本給巴勒斯坦一億美元人道援助。。。

他突然走到陽台，問，「你知道為什麼有些歐洲人反對簽署『歐盟大憲章』嗎？」

不知道。

「他們說大憲章沒有把基督教的信仰明白寫進去。你覺得該不該寫進去？」

我想了一下，摘下幾朵香氣沁人的玉蘭花，然後給他一個「初步答案」：「我不贊成。可以寫進某些共同的核心價值，但是不必是宗教，更不必是基督教啊。難道歐盟裡只有基督徒嗎？或者，難道歐洲人結盟的願景和理想，是把歐盟變成一個基督教聯盟嗎？」

他又回到電腦前，安靜沒幾分鐘又大聲說，「俄國石油大王被起訴，可能要坐十年牢。」

「這個人，」我說，放下了水桶，「第一桶金不知怎麼來的，不見得是好人，但是他以為俄羅斯民主了，可以真的搞反對運動了，被整得這麼慘，也夠可憐。」

「他沒料到普丁會做得這麼絕吧，」華飛說，「主要是，普丁要把俄羅斯的油重新收歸國有。」

我關上陽台的門，不知為什麼，竟然很認真地對這半大不小的孩子說，「華飛，你要永遠認得那個時刻，當你的國家變質、不值得愛、不能愛又無力對抗的時候，馬上就走。湯瑪斯曼和愛因斯坦都認得那個時刻。」

他伸了一個懶腰，打了個呵欠：「媽，你以為德國的二十世紀是白過的？下一個一百年大概都不會再出那樣的事了。我真運氣。」

# 為什麼燈泡不亮 ——我看香港的「國際化」

明報 2005-05-17

香港人真的很有國際觀嗎？——有多少香港大學生了解京都議定書是個什麼來龍去脈？假定他聽過這個詞，他又是否知道為什麼俄羅斯簽，美國不簽，中國又簽了沒有？他是否說得出來「溫室效應」究竟影響了什麼？布殊侵略伊拉克這個行為，包含了幾個層次的意義，可以有幾種立場的觀點？他是否能以全球貧富差距問題進行一場辯論？聯合國的二〇一五計劃——在校園裏辦各種活動的學生們，有幾成聽說過？幾成的人知道「沙哈拉沙漠以南」代表什麼？

挑出二〇〇五年三月十二日那一天台灣幾個比較認真的報紙，尋找國際新聞，發現每一個報紙不超過十條。其中兩三條是政治的即時性新聞，譬如歐美協議如何處

理伊朗核武的威脅，剩下的，全是國際的鹹濕「社會新聞」：美國強暴犯當庭槍殺法官。麥可傑克森性侵兒童案繼續。性侵幼童德國神棍被捕。十三歲男童強暴女老師。紐約警察受僱作槍手殺人……

### 「雜碎」的國際報道

國際化程度明顯超過台灣的香港，應該很不一樣吧？我的發現讓我自己吃了一驚，幾份主要的香港報紙的國際報道竟然和台灣的幾乎一樣，當天還多出一條台灣沒有的：一夜歡情，某國某男子把「陽貨」卡在戒指中。

那麼究竟當天世界上發生了些什麼事呢？我只好上網瞧瞧。美國觀點的《紐約時報》有這些：

英國的「非洲調查報告」出爐，要求每一個先進國家將外援大幅增加到國家預算的百分之零點七。英、法、西班牙都已做到，美國卻落後很遠。敘利亞白黎巴嫩撤軍。玻利維亞總統梅薩得到國會支持，繼續執政，但是政治情勢極不穩定。



美國法院判決，美國政府應對匈牙利猶太人賠償二戰間所掠奪的財產……歐洲觀點的《法蘭克福匯報》有這些：歐盟準備限制中國紡織品進口，因為中國紡織品嚴重威脅歐洲經濟。

華人在柏林遊行，抗議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伊拉克的經濟重建碰到很複雜的問題。馬其頓大選被指控作票。法國哲學家談車臣獨立的坎坷以及俄羅斯的霸權……

政治新聞之外，還有財經的和文化方面的國際新聞，譬如聯合國經濟學家對全球化的看法，譬如巴西的小說家、伊朗的電影導演、古巴音樂的評介等等。

三月十二日的日本《讀賣新聞》網上版有二十條國際新聞；新加坡《聯合早報》網上有八條國際新聞，加上轉載十五篇與國際有關的報道。

對比之下，台灣和香港的中文媒體，不知誰影響了誰，還真像：國際新聞的量非常少，而在極少量的國際新聞中，有高比例的姦淫擄掠聳動「雜碎」，要不然就是

浮面的瞬間發生的事件。事件之前的歷史脈絡和深層意義，事件之後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響，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抽絲剝繭等等，卻極為欠缺。

大學生知道什麼？

這樣的發現令我驚訝，因為，香港的國際化程度超過台北，是一個那麼明顯的事實。二〇〇四年台灣有一百零三萬人次的觀光客，香港的觀光客卻超過兩千一百萬人次，是台灣的二十倍。兩千一百萬人次中，一半來自中國大陸，但至少有一半來自世界各國。觀光客多的城市，不可能是一個太閉塞的城市。

台灣在政治上全面孤立，長年被排除在國際社會之外，相對之下香港與國際的接觸機會特別多，各形各色的國際會議此起彼落、經年不斷地在這裏發生。就以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世貿組織將在香港開會來說，一個這樣的會議給香港人帶來什麼？因為要負責協調，從官員到最底層的小公務員，在與各國政府和代表不斷的來

往溝通中，接觸了國際的議題，更學到國際應對的技巧。衝着世貿會議，全世界反全球化的組織也動員要來香港抗議，由香港的民間團體負責統合。於是香港的民間團體從統合的運作中也將學到全球性的組織操作，而且在一瞬間就與全世界的反對組織接軌。至於普通市民，由於屆時新聞的炒作，那平常不關心的人對世貿議題都會得到多一點的認識，平常關心的人則更有機會取得第一手的信息。

每一次國際會議就像一顆石頭拋進池塘裏，漣漪一圈一圈擴散，整個池子受「波及」，而所謂「國際觀」，就是在這種不斷的漣漪「波及」中逐漸累積見識，逐漸開闊眼界，使「池子」裏的人，覺得自己是國際社會的一分子。

香港人和台灣人一個重大的差別在於，台灣人在多年的政治封鎖之下，很不幸地已經相當與國際社會脫節，而香港人，由於歷史所提供的多種族、多元共處環境，以及做為中西交匯點的地理條件，很自然

地感覺與國際同一個脈動。南亞海嘯香港人人均捐獻居世界第一，一個很核心的解釋，我認為，是因為香港人覺得那些沙灘上各國各種的死難者，都是他的「街坊鄰居」，很貼近他的心；香港的島上向來就住着無數各國各種的人。太多的「外國人」，其實就是正牌的香港人。

所以香港人其實是在一種國際環境中長大的。可是，為什麼平面媒體的國際新聞那樣貧乏？

我無法回答。只能說，與國際接觸多，可能不代表人們因而對國際就有深刻的認識，有獨立的觀點。

檢驗這個問題，或許也可以換一個方式來問：香港人真的很有國際觀嗎？譬如說，有多少香港大學生了解京都議定書是個什麼來龍去脈？假定他聽過這個詞，他又是否知道為什麼俄羅斯簽，美國不簽，中國又簽了沒有？他是否說得出來「溫室效應」究竟影響了什麼？布殊侵略伊拉克這個行為，包含了幾個層次的意義，可以

有幾種立場的觀點？他是否能以全球貧富差距問題進行一場辯論？聯合國的二〇一五計劃——在校園裏辦各種活動的學生們，有幾成聽說過？幾成的人知道「沙哈拉沙漠以南」代表什麼？

把中國放在全球視野中

兩千萬人次觀光客之中，一半是大陸訪客，香港人又從這一千萬人次的到訪中，增加了多少對中國的認識？討論中國的層次，除了喜歡內地人來買黃金和化妝品，除了憎惡內地人講話大聲不守規矩以外，多少人認真地、宏觀地去了解中國？從前用英國殖民者的眼光若即若離地看中國，九七之後轉而用「心繫家國」的角度看中國——有熱烈擁抱，也有冷淡排斥。我總是聽見香港人辯論：究竟應該把中國看成一個現代化進程緩慢的實體，與之保持一種距離，努力維持英國人留下來的現代化遺產，不被中國同化；還是把中國看做不容置疑的祖國，無條件地熱愛它、擁抱它、維護它所有的美好和惡劣。

我思索的是：除了這兩者之外，有沒有第三個可能的角度？夾在殖民情結和祖國情結中搖擺困惑的香港人，可不可能加一個宏觀的角度——把中國放在一個全球視野中去了解？

對於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在新世紀的「崛起」，它歷史的悠遠曲折、種族的多元多樣、文化的強韌深厚、市場力量的舉足輕重、政治情勢的複雜微妙、對全球發展影響之巨大深遠，中國根本就是一個重大的全球現象，一個二十一世紀不可忽視的新的國際趨勢。香港人除了「矮矮」地仰頭遠望之外，或許也可以像任何其他「正常」的社會——法國、瑞典、馬來西亞、日本——一樣，認真而專注地去研究它、深刻而客觀地去了解它、理性而自主地去對待它。無條件地擁抱和預設不信任的排斥，其實不是唯一的角度。

但是，在熱烈的「烽煙」節目中，在酒酣耳熱的晚餐桌上，在商人聚會的餐廳酒樓裏，在大學和中學的講堂裏、在青少年

的網路聊天室裏——溫室效應、伊拉克戰爭、聯合國扶貧計劃、北剛果的種族屠殺、俄羅斯的民主困境、富國與貧國的劇烈矛盾、中國的嚴重生態問題……這些議題在香港的生活環境裏，被提及、被討論、被辯論的機率又有多少呢？

聯合國2015目標 1990-2004進度對兒童影響1：貧窮人口減半\*貧窮人口定義：每日淨收入低於一美元2：飢餓人口減半中國及印度的經濟大幅成長，導致世界平均收入提高，此目標已達成，但實際上沙哈拉沙漠以南，貧窮問題毫無改善個人平均所得提高不等於兒童福利提高。即使在印度和中國，兒童處境改善極為有限。沙哈拉沙漠以南國家，兒童處境更惡化。全世界所有兒童都能完成小學教育沙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無法達成全球有21億的兒童失學。以目前發展速度預測，到2015年將仍有7500萬兒童失學—70 %在沙哈拉沙漠以南地區。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降低 2/398個國家無法做到。在沙哈拉

沙漠以南、伊拉克、老撾、前蘇聯地區，兒童死亡率甚至增高。每天有3 萬兒童因小病而死亡。如果各國捐款不增加，兒童死亡率到2015年會減低 1/4，達不到 2/3 的目標。婦女因生產而死亡比例降低 3/4 目標只達成17 %。每年有50萬女性因懷孕或生產而死亡。母親死亡，嬰兒存活率亦受影響。

燈泡何以發光？因為燈泡後面有一套細密的電路網絡；水龍頭何以出水？因為水龍頭後面有一套完整的供水流程；樹幹何以成林？因為樹幹下面緊連着一套

環環相扣的生態鏈結。語言何以啟蒙？因為語言後面有着一整套幽微細緻、深奧繁複的思想系統。

確實不少有遠見的人，在大聲疾呼「國際化」的重要。但是不論是在台灣、大陸、新加坡或香港，「國際化」不經思索就被簡化為「學英語運動」；大學爭吵是否將英語變成規定教學語言，中學在憂慮母語教學是否耽擱了國際化的成效，同時



英語運動鋪天蓋地席捲而來；漢語都還講不好、中文都還不會寫的幼兒，開始上密集而嚴苛的英語課。從上到下其中隱藏的邏輯是，英語好，就有國際觀，就能與國際接軌。

國際觀，與國際接軌，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 全球公民意識

回到所謂國際新聞作為一個觀察點。許多西方的重要報紙都特別開闢「學生版」，引導十來歲的中學生關心公共事務。《紐約時報》的學生版比較淺顯，德文《時代周報》的學生版比較深入。差別的原因可能是，美國自居全球強勢，習慣自我中心思維，一般人對國際知識並沒有迫切的渴求，而德國經過兩次戰爭的慘重打擊，對民族主義戒慎恐懼，整個教育內涵極端強調國際參與的角度。漢堡的《時代周報》三月十二日的「學生版」新聞導讀的主題就是南亞海嘯。

學生先讀一篇聯合國經濟顧問薩賀斯的

專訪。薩賀斯的主要觀點是，海嘯或地震種種自然災難事實上不僅只是自然災難，受害的輕重與人為因素有關。譬如同樣一場加勒比海颶風，同樣的威力，在貧國海地死傷上萬，在彼岸的邁阿密卻只有十來個人死亡。預警系統的完備、房舍的堅固、政府危機處理的效率、災後重建的財力和救濟網絡，在在都突顯全球的貧富差距，因此富國對窮國有協助的義務。薩賀斯批評聯合國做的不夠。

由南亞海嘯引出全球貧富問題，由貧富問題引出對聯合國計劃的檢驗。緊接着小讀者會看到這樣一個對照表(我只取其中一部分)：給學生的討論命題是：

- 1．南亞海嘯和貧富差距有什麼關係？
- 2．西方國家有責任嗎？為什麼有責任？或者貧國之間也缺乏統整？
- 3．除了政府以外，跨國企業的責任可能會是什麼？
- 4．比較聯合國的目標和薩賀斯的批評。你覺得他的批評合理嗎？為什麼你這

樣認為？

透過一篇國際報道，中學生認識了亞洲，認識了貧國與富國之間的互動關連，認識了全球災難中自然和人為的因素，認識了聯合國的體制運作，認識了富國對地球村的道義責任。這樣一篇國際新聞，其實是在培養下一代的「全球公民意識」：我們在地球這一端吃的食物、穿的衣服、呼吸的空氣、製造的垃圾、發展或收斂、激進或保守、掠奪或放棄，每一個動作都和萬里以外另一端的人們有最緊密的關連，彼此的作為互相影響，而且最終要共同承擔後果。

有了這種超越國界的公民意識，人們對於自己國內的事務就有不同於以往的評斷標準。所謂國際化國際觀，所謂與國際接軌，指的應該是這種「全球公民意識」的建立：對於其他國家的歷史和現狀有一定的認識，對於全球化的運作和後果有能力判斷，對於人類社區的未來有所承擔。

有足夠的知識、能力、承擔，去和全球

社區對話、合作、做出貢獻，叫做國際化。《時代周刊》這整套對年輕人「國際觀」的培養，是以德文進行的。老師們在課堂裏和學生就國際種種議題的討論，也是以德語進行的。他們可能也會試用英文來對話，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用結結巴巴、半生不熟的英語，所能夠達到的思想深度與理解強度，和用自己最嫻熟的靈魂的語言——母語，是不能比的。

將燈泡黏到牆上

有沒有國際觀，能不能與國際接軌，不在於英語說得流利不流利，而在於有沒有深刻健全的「全球公民意識」；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學英語，就有了國際化，有了全球視野嗎？

一個來自沒水沒電的山溝溝裏的人第一次進城，很驚訝看見水龍頭一扭，就有水流了出來。很驚訝看見牆上的燈泡，一按就有光。於是他設法取得了一節水龍頭和一個電燈泡。回到家裏，將燈泡黏到牆上，將龍頭綁在棍上。結果燈不亮，水也

不來。一個北方荒地的人走過南方沃土，看見一片蔥綠豐美的樹林。他把樹全砍下，把樹幹像棍子一樣一根一根栽進他的荒地裏。等了一年，沒有樹林，只有棍子。

燈泡何以發光？因為燈泡後面有一套細密的電路網絡；水龍頭何以出水？因為水龍頭後面有一套完整的供水流程；樹幹何以成林？因為樹幹下面緊連着一套環環相扣的生態鏈結。語言何以啟蒙？因為語言後面有着一整套幽微細緻、深奧繁複的思想系統。我們知道沒有後面那個無形的網絡鏈結，燈泡不發光、龍頭不出水、樹幹不抽芽，但是請問，為什麼我們認為英語會帶來全球視野和國際觀？

英語，當然非常重要，因為對於非英語人而言它是一個簡便的萬用插頭，放在旅行箱裏，到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拿出來，插上電。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以為電的來源就是這萬用插頭。事實上，插頭不能供電，英語也給不了思想和創造力。

英語會變成一個強勢語言，是因為在英語的世界裏出現了累積了強大的創造力：用英語思考的人寫出了「大憲章」，發明了蒸汽機和電燈，發動了成功的革命，船堅炮利無所不克，萬商出動縱橫海上，訂下了民主規範，領先了科技的發展，又在思想藝術的領域裏出類拔萃。是深邃的思想和創造力造就了語言的強勢，不是語言帶來了深邃的思想和創造力。如果英語人當初被迫要用俄語或中文來進行思考和表達，而對本身母語英文的掌握反而是二流的，是詞不達意的，是粗糙而無法進入幽深細微之處的，我不相信英語文化會如此燦爛有光。

從崇山峻嶺中一縷溪流，千曲百折匯集成大水，轉化成能源，再經過無數精密的設計，最後我們客廳裏的燈泡亮了。可是光的來源是什麼？不是燈泡，不是插頭，是那起自崇山深處的整套過程。我們要培養國際觀和接軌國際的能力，必須從那大水的起點、民族創造力的源頭去尋找，也

就是在自己的文字語言的深水水庫中先學會深潛呼吸和悠游自如，絕不是去買個燈泡，拿回來黏在牆上而已。

## 香港，你往哪裡去？ 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一點偏頗的 觀察

到稅務局繳完了稅，下樓時覺得特別神氣，從此以後多了一重身份：香港的納稅人。寫這篇文章，就是在盡一個香港納稅人的義務，當然，也是權利。

### 石水渠街的野薑花

從稅務大樓出來，橫過幾條大道就可以到石水渠街，我要到那兒買一把野薑花。

窄窄的石水渠街是一個露天市場，擠擠攘攘的，人情味十足。鞋店前放著幾個水桶，火百合、滿天星、野薑花，隨興地「扔」在裡面，愛買不買。海產店前一攤一攤的鮮活漁貨。一隻巴掌大小的草蝦蹦到隔鄰的一籠青翠的菠菜上，又彈到地面；嚇了一跳的家庭主婦將它撿起，笑咪咪交還給魚販。腆著肚子的屠戶高舉著刀，正霍霍地斬肉；千錘百鍊的砧板已經凹成一個淺盆。駝背的老太太提著菜，一步一步走在人群裡，雖然擁擠不堪，她不慌不忙，顯然腳底熟悉每個地面的凹凸，眼裡認識每個攤子後面的鄉親。

野薑花聽說來自南丫島的水澤裡。我買上一大把，抱在懷裡，搭上開往石塘咀的老電車，一路叮叮噹噹晃回西環。

## 一道公民考題

如果我是香港的公民教育老師，我會出這麼一個考題：



中區警署十七棟古意盎然的歷史建築要交給地產商開發。灣仔的石水渠街露天市場要拆除，古老「印刷一條街」利東街要拆除，灣仔老街市要拆除。。。舊的，老的、矮的建築，狹窄的擁擠的老街老巷，要讓位給玻璃和鋼筋的摩天大樓，變成昂貴的公寓大樓或者寒光懾人的酒店商廈。

西九龍文娛區的競標廠商紛紛提出了規劃，毫無意外地，全是地產財團。標書指定要有的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廳，地產商正在進行全球性的合縱連橫、做如火如荼的宣傳。香港的報紙突然每天都是國際美術館的長而拗口的名字。

同時，公民教育委員會製作了一個宣傳短片，「心繫家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配上溫馨動人的畫面，每天在新聞報導前播出。精心包裝的愛國教育在悄悄進行中。

請指出，以上看起來互不相關的三件事，隱藏著什麼內在的關聯？試從三件事中看出香港的文化政策及公民社會的發展狀態。

## 「中環價值」壟斷

香港宣傳自己的標語是：亞洲的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 這個自我標榜沒錯，觀光客所看見的香港也是這樣一個面貌：地面上有高聳入雲的大樓、時髦精美的商店，地面下是四通八達的運輸密網、人定勝天的填海技術。看得見的是名牌銀行林立，貨櫃碼頭如山，看不見的是精細複雜的金融制度，訓練有素的專業人才，清廉效率的政府、法治的管理。

國際上所看見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樂於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香港：建築氣勢凌人、店鋪華麗光彩、英語流利、領口雪白的中產階級在中環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

步穿梭。也就是說，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

外面的人走在中環的大道上，仰著脖子欣賞高樓線條的炫麗，不會看見深水埗街上那些面容憔悴、神情困頓的失業工人，或是多年住在觀塘和元朗卻從沒去過中環的新移民婦女。外面的人守在尖沙咀海濱星光大道上等候驚天動地的煙火表演，不會想到，香港七百萬人中有一百四十五萬人活在貧窮線下，有很多很多的獨居老人像雞鴨一樣長年住在籠子裡；不會想到，這個「亞洲的國際都會」在貧富不均的指標上高居世界第五，與智利、墨西哥、哥斯達尼加、烏拉圭同流。外面的人不會想到，姿態矜持而華貴的中環其實只是香港眾多面貌中的一個而已。

這樣的敘述，其實也不正確，因為我很快就發現，香港裡面的人，也有許多人看不見中環以外的香港，也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在堅持。

拆，拆，拆

九龍寨，調景嶺，早就拆了。因為九龍寨和調景嶺骯髒、混亂、擁擠，用「中環價值」來衡量，代表了令人羞恥的「落後」。九龍寨和調景嶺所凝聚的集體記憶與歷史情感，是掃進「落後」的垃圾堆裡一併清除的。

旺角的郎豪酒店剛剛落成。龐大的建築體積座落在窄窄的上海街上，高牆效應使上海街上的人變得非常微小，彷彿老鼠爬在牆角下。啟德機場移走之後，九龍的建築限制改變，郎豪預告了九龍將來的面貌：九龍也將中環化。

灣仔的 Mega Tower 酒店也是地產商一個巨大的建築計畫，如果通過，意味著灣仔老街老巷老市場的消失，老鄰居老街坊的解散；意味著原本濃綠成蔭的老樹要被砍除，栽上人工設計出來的庭園小樹，加棚加蓋鋪上水泥，緊緊嵌在大樓與大樓之間。

Bauhaus 風格的老街市要被拆除，藍色的老屋要被拆除，石水渠街的老市場要被拆除，中區警署的歷史建築群，包括域多利監獄，要交給地產商去「處理」，讓他們建酒店商廈。更多的酒店，更多的商廈，更多的摩天大樓，像水淹過來一樣，很快要覆蓋整個香港。

中區警署：祖母的日記能招標嗎？

來香港一年，有很多的驚訝，但是最大的震驚莫過於發現，香港政府對於香港歷

史的感情竟是如此微弱。讓我們看看中區警署。就藝術而言，中區警署建築群的風格代表了殖民時代的美學，在香港已經是「瀕臨絕種」的稀有建築。就歷史而言，域多利監獄當年監禁過反清的革命志士，也殘害過反日的文人。是否監禁過孫中山，史學家還在辯論；即使將來證明沒有，辯論的過程本身也已經為歷史添加了重量。而即使沒有孫中山，難道戴望舒的獄中血淚還不足以使這個監獄不朽嗎？ \*

### **獄中題壁**

**如果我死在這裡**

**朋友啊，不要悲傷**

**我會永遠地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

**當你們回來，從泥土**

**掘起他傷損的肢體。。。**

**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著太陽，沐著飄風**

**在那暗黑潮濕的土牢**

**這曾是他唯一的美夢**

**1942年4月27日**

除了戴望舒之外，還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歷史深埋在域多利監獄裡？牢房裡頭若是江洋大盜，他可能凸顯了香港的治安史；若是因貧困而犯罪的升斗小民，他就呈現了香港的底層庶民生活史；若是飢寒交迫的非法移民，他就刻畫了香港顛沛流離的遷徙史；若是屈打成招的政治犯，他就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史押上了筆錄。

每一個牢房、每一面牆，都是香港史的證物。我敢說，域多利監獄裡的每一塊磚都是濕的，因為它滲透了香港人的母輩祖輩的淚水和嘆息、香港人集體的創傷和榮耀。政府哪裡有權利把它交給地產商去「處理」掉？你會把祖母手寫的日記本拿去招標出售嗎？

監獄是要保留的，政府說，但是環繞監獄的很多其他老建築，不是太珍貴。或

許，但是，請問，做過完整的歷史調查嗎？認真問過市民的想法嗎？歷史建築的文化價值若是真正被重視，為什麼我們只聽見「經濟效益」四個字？監獄的歷史意義若是真正被珍惜，你可能把它和週邊環境截斷，讓它孤伶伶地站著，被高聳逼人的酒店和商廈包圍？

如果我是。。。

作文題目：如果中區警署建築群是在台北，我會麼麼做？

如果我是文化局長，我會馬上成立一個專案小組進行這幾件事：

1. 對市長和財長進行說服：歷史記憶是市民身份認同的護照，使一個群體有別於他人的感情印記。而文化保存是一個城市的命脈，與經濟發展也可以並行不悖。

2. 對十七棟建築的每一棟進行深度多元



的歷史調查。以域多利監獄為例，委託歷史學者開啟所有監獄檔案，研讀每一個個案，書寫域多利監獄史。透過對政治犯、冤案、犯罪紀錄、懲罰與感教制度演變等等的研究，香港與中國近代史以及英帝國殖民史血肉相連的一頁可能有嶄新的視野出現。如果資料夠豐富，甚至思考成立監獄博物館，譬如莫爾本的監獄博物館就是那個城市最辛酸、最動人的一個歷史博物館。

十七棟建築，就是十七種最疼痛、最深刻、最貼近香港人心靈的香港史。以後每一個跟著老師進去走一遍的小學生，都會從一塊磚裡頭看見自己的過去，從而認識自己的未來。

3. 向企業及大眾募款，發起認養古蹟運動，成立國民信託基金。大企業可以捐鉅款，小市民可以「一人一百塊」作古蹟之友。基金用來修復古蹟，同時作為永續保護以及管理經營之用。

如果我不是決策官員而是個小市民，那麼我會用盡力氣發起公民反抗運動，串連所有的非政府組織——環保團體、消費者團體、小學家長會、被虐婦女保護協會、勞工權益促進會、文史工作室、青年義工。。。，包括國際組織；我會結合所有大學的歷史系、建築系、城鄉研究、都市計畫、景觀系以及教育學院將來要為人師者的學生和教授們，與政府進行長期的抗爭。我會靜坐、示威、遊行。我會不斷地投書給本地和國際的媒體，我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求援，向國會議員申訴；我會尋找律師探討控告政府的可能。

最後，告訴你我最後會做什麼：我會用選票把不懂得尊重文化、輕視自己歷史的政府選下去，換政府。但是香港的政府是不能換的，因為沒有普選。

西九龍：為誰而建？

香港政府不僅止將充滿歷史記憶的老區交給財團去開發，空曠的新地同樣放任財團去發展。西九龍簡直就可以直接寫進文化政策的教科書當作負面教材範例。香港核心區最後一塊濱海的鑽石地帶，如果講明要做商業開發，靠賣地賺錢，也就罷了，可是政府說，這將是文化項目，要有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廳等等，要在文化上建設香港。

要建設一個文化的香港，是不是先要知道香港有什麼，缺什麼，哪裡強，哪裡弱？在招標之前，起碼有幾十個非做不可的研究調查：

譬如藝術教育整體研究：香港的教育制度裡有多少藝術教育？與國際評比如何？藝術教育缺哪一環？香港人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有怎樣的文化素養？西九龍規劃需不需要把青少年的藝術教育當作核心思考？

譬如創意產業調查分析：哪一個產業在香港最具競爭力，最值得重點扶植？如何扶植？動畫是否已被韓國領先？水墨是否有發展空間？設計是否是香港的優勢？如果是，應該設立博物館還是設計學院還是兩者都不要？

譬如藝術人才培養計畫：除了補助以外，是否應該有制度的變革？是否應該提升智慧財產的保護、是否應該加強大學的藝術科系，西九龍如何用來培養本土創作。。。

譬如欣賞人口的擴展：十八歲以下的藝術欣賞人口有多少？什麼獎勵或補助制度可以創造欣賞人口？什麼設施可以吸引更多年輕的藝術欣賞者？

譬如弱勢公民文化權的普查：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看什麼戲、聽什麼歌、享用到

幾成的文化設施？盲者、聾人、單親媽媽、同性戀者、坐輪椅的、精神病患、監獄犯人、外籍勞工、尼泊爾和巴基斯坦的弱勢族群、貧窮線下的赤貧者、赤貧者的孩子。。。享用到多少文化的公共資源？康文署所提供的活動裡他們的參與是幾成？如果弱勢者的文化權沒有被照顧到，那麼西九龍是否應該將之納入考量？

譬如現有文化設施的全面體檢：歷史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等等，現有多少參觀人數？藝術教育效應評估如何？是否低度使用？是否浪費空間？是否經營不善？是否資源重疊？

譬如2030年香港文化發展藍圖的提出：香港對自己的文化期許、文化定位是什麼？它所缺的究竟是草根性質的社區兒童圖書館、街坊藝文活動中心，還是水晶燈紅地毯、一張椅子一萬塊的現代演藝廳？要補強的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現代的還

是傳統的、本土的還是國際的？

譬如。。。。

零零星星的研究確實在進行中，但是並沒有整體的藍圖。好像掛一張巨大的文化地圖在牆上，將宏觀的未來藍圖透明疊在現存狀態上，就可以清楚看見自己的強項和弱點。西九龍應該發揮什麼功能，應該包含什麼設施，應該或不應該做什麼，必須放在這樣一個宏觀、前瞻的藍圖上去思索，才是負責任的規劃。

沒有全面的研究調查，沒有宏觀的文化藍圖，也渾然不談香港的文化定位，就把西九龍交給財團去自由發揮。財團怎麼做呢？他關心香港的藝術發展嗎？他瞭解香港的文化潛能和文化困境嗎？他有文化的前瞻能力嗎？他對邊緣人、小市民的文化公民權要負起責任嗎？

西九龍落在商人手裡，於是我們就看見

典型的香港商業操作上演：一個說，邀了龐畢度來開分店，另一個就說要與古根漢合作，第三個更厲害，找來了「八國聯館」，號稱要聯合北京的故宮、芝加哥美術館、俄羅斯埃爾米塔日故宮博物館、羅浮宮和奧塞、澳洲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及亞伯特美術館、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西班牙普拉多美術館。商人玩藝術家、建築師、美術館的名字跟他們玩 **Gucci** 皮包、**Bali** 皮鞋、**Armani** 服飾、**Dior** 化妝品手法一樣，只是文化的意義被淘空。

有沒有人問：這些聲名顯赫的國際美術館進到西九龍，為香港人帶來什麼？香港的孩子會得到更好的藝術教育？本地的藝術家會得到更多發表的空間、創作的資源？香港文化會從此紮根，香港人會因而對香港文化更有自信？還是說，香港因此會吸引法國人來香港看羅浮宮和奧塞分店，吸引美國人來香港看古根漢分館，吸

引俄羅斯人、加拿大人、西班牙人來香港看他們國家的東西，或者北京人來香港看故宮典藏？

西九龍究竟是為什麼而建？為誰而建？更核心的是：香港的文化藍圖究竟是什麼？人文素養的厚植、文化發展的永續，策略又是什麼？如果對人文有關懷，對未來有擔當，這些問題都是決策者不能逃避的問題。

但你不能對商人這樣要求；商人是為了賺錢發財而存在，政府才是為了關懷和擔當而存在。對香港的孩子、藝術家、文化發展、城市前途有責任的，不是這些商人，是政府。當政府沒有關懷和擔當時，那就是一個有問題政府。

開發，是香港的意識型態

老區成片成片地剷除，新區不經思索地



開發，財團老闆坐在推土機的位子上指揮，政府官員坐在冷氣呼呼的辦公室裡微笑。當財政司長笑瞇瞇地宣布要「開發」大嶼山——建設刺激遊樂場、水上遊樂場、高爾夫球度假村。。。我又像野貓一樣弓起背、毛髮直豎，想問：你的2030年城市藍圖是什麼？發展還是保育的抉擇、香港的城市定位，都清楚了嗎，在你把綠油油的大嶼山交給財團、變成工地之前？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型態。「意識型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

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複，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裡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大樓的反光，很冷；飛鳥誤以為那是天空，撞上去，就死。

城市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是：老街上有老店，老店前有老樹，老樹下有老人，老人心裡有這個城市特有的記憶，他的記憶使得店鋪有任何人都模仿不來的氛圍、氣味和色彩。如果不是老店，那麼什麼都不怕的年輕人開起新店，店裡每一根柱子，柱子上哪怕是一根釘子，都是他性格和品味的表達。離了婚的女人開起咖啡館，每一只杯子、每一張桌布每一瓶花草都是她個人美學的宣示。老婆婆的雜貨店賣的酸菜

還泡在一個你從小就看過的陶缸裡，成為你日後浪跡天涯時懷鄉的最溫暖的符號。

香港不是沒有這種個性和溫暖，買得到野薑花的石水渠街、印過喜帖和革命文宣的利東印刷街，都是香港最動人最美麗的城市面貌。但是在「開發」的意識型態主導下，他們在一條街一條街的消失，被千篇一律面無表情、完全看不到「人」、看不到個性的都市建設所取代。

政府和財團進行土地的買賣，嘴裡吐出天文數字，對著鏡頭談經濟效應；我納悶的是，那麼誰在負責思考：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

你可認識歌賦街？

我所目睹的二十一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

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

殖民思維有幾個特點：它一不重視本土文化和歷史，二不重視草根人民，三不重視永續發展。

英國人統治時，他所立的銅像、所寫的傳記、所慶祝紀念的生日忌日、所歌頌的傳奇、所愛惜的古蹟，所命名的街道，當然都是英國角度出發的人物和歷史。對於中國和香港本土的歷史記憶，是漠視和輕視的。王韜、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魯迅、蕭紅、張愛玲、許地山、戴望舒、蔡元培、錢穆、徐復觀、余光中。。。這些名字都沒什麼意義。華人因鼠疫而死亡的口述歷史、房舍因大火而焚燒殆盡的遺址、鄉民因抗英而犧牲的地點、大罷工時工人集會的廳堂、文人因反日而被害的日記、魯迅演講的大堂。。。在殖民者眼中，無關緊要。

於是所謂「脫離殖民」，最重大的意義之一就是，人們回頭去把自己被扭曲、被改寫、被漠視被輕視的歷史挖出來；把被殖民者丟到垃圾堆裡的祖母的日記找回來，擦乾淨，重新，一字一句地辨認，一字一句地讀，從脆弱泛黃的紙張和蒼白的字跡裡，重新發現自己是誰。「脫離殖民」意味著，每一個香港孩子走過中環歌賦街時，知道「歌賦」（**Gough**）不過是某英國陸軍中將的名字罷了，但是他更知道歌賦街四十四號的中央書院是孫中山讀過的學校，歌賦街二十四號是孫中山、陳少白等「四大寇」意興風發秘密革命之處。

「脫離殖民」意味著，把殖民者所灌輸的美學品味、價值偏重和歷史觀點——不見得推翻，但是徹底重新反省，開始以自己的眼光瞭解自己，開始用自己的詞彙定義自己；後殖民的政府會把本土的文化歷史古蹟、老街老巷老記憶，即使不美麗不

堂皇不甚體面，一點一滴都當作最珍貴的寶貝來保護珍愛。

我沒看到這個過程真正在香港發生。

## 文化缺席的政府

更確切地說，殖民者並非僅只不重視被殖民者的文化，他原則上不重視文化，因為文化是思想，思想勢必意味著獨立思考和價值批判，這些都是對統治的障礙。從香港政府的組織架構就看得出，文化在這個城市的管理和發展上，是毫無地位而且極端邊緣的。香港沒有文化的專責機構，文化藝術「夾帶」在民政局的業務內，與捕鼠滅蚊、足球博彩、郵票設計、幫傭管理、游泳池清潔、大廈與旅館業監督等等混在一起。民政局的「使命」列出十四條，其中只有兩條直接與文化有關，哪兩條呢？

最重要的是文康，也就是說，香港對文化的理解還停留在辦理康樂活動的層次。另一條是古蹟保存。把古蹟保存列為十四條之一，不是很不錯嗎？但是你發現，古蹟保存的工作是由一個層次極低的三級單位來負責。在民政局屬下還有各種圖書館、藝術館、博物館等等，各自辦理自己的活動。這個結構所凸顯的是，文化處於下游，根本進不了最上游的決策，或者說，在最上游的決策機制裡，根本就沒有文化的思維和視野。

我們可以想像這樣一個鏡頭：最高的決策會議討論中區警署的議題時，財政司長、工商局長、經發局長、運輸局長、房屋及規劃局長可能都從經濟本位去發言，那麼誰站起來為古蹟的文化傳承和歷史意義去力排眾議、「咆哮公堂」呢？民政局長的本位不一定是文化，可能是民政。所以文化的位子上，其實是空的。所有的決策，就在文化缺席的狀況下，做了。在一

個文化缺席的政府結構裡，當然經濟效益可以超過任何別的考慮，開發意識型態可以勢如破竹地進行，都市建設可以由財團主導，城市品味由工程及經濟官僚決定。。。

為什麼會這樣呢？殖民者在的時候，他無心厚植文化根底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知道自己遲早要走，香港不是他的家。開發是理所當然的意識型態，開發所得，豐富了他的母國——他真正的家。至於開發是否犧牲一些其他的價值，譬如社會公義或歷史情感或造成文化的虛弱，他不必在意。於是所謂脫離殖民，意味著後殖民政府回頭去挑戰殖民者的開發至上哲學，把殖民者所忽視的價值翻轉過來放在首位思考：對貧民和弱勢的照顧、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對綠色土地的鍾愛、對下一代人文教育的長程投資等等，一種「厚植本土、文化優先」的思想，在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之後會取代



「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變成新的主流哲學。也就是說，在後殖民政府裡頭，文化理應成為首席局。

但是我並沒看到這個過程在香港出現。

一萬個口號抵不過一支老歌

殖民者挾其母國的現代化優勢，他的政府一定是由菁英思維主導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府官員掌握知識、能力和權力，一切的決定由上而下貫徹。捉襟見肘時，一通半夜的電話掛往母國，第二天早晨已有指示。母國畢竟文化厚重，經驗嫻熟，往往還在殖民地創出優越的成績。於是所謂脫離殖民，就是在別人的「大腦」抽走了之後，開始產生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法從哪裡來？當然是民間。

脫離殖民意味著政府從原本居高臨下的

菁英位置走下來，與自己的平民站立在同一高度對話；中區警署保存或開發，灣仔老區保護或拆除，由市民的意志主導。康文署也不再是所有活動的主辦者，不再掌握所有資源，不再是藝術家和表演團體仰望的施捨者，民間自己實力強大、百花齊放。脫離殖民意味著本地的學者、專家、文化人會取代殖民者的「大腦」深入政府的決策過程，不再坐在林林總總的「諮詢委員會」裡當政府假裝民主的花瓶，而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實質主要動力；西九龍的文化定位，大嶼山的開發與否，都會有一個深刻的公民辯論、知識界文化界專業較勁的過程。同時，當人民開始真正參與決策，開始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未來時，公民社會於焉成形。

我也沒看到這個過程真正在香港產生。

我目睹的，反而是另外兩種過程。一方面，殖民者的思維模式和運作方式照樣

推著香港快快走，用原來的高效率，但完全不見「大腦」的更新。另一方面，新的「公民教育」悄悄發酵：「心繫家國」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調成甜甜的飲料，讓香港人喝下一杯「愛家愛國」。幼稚園的孩子們學唱「起來，起來，起來。。。」「公民教育被簡化為愛國教育，愛國教育被簡化為愛黨的政治正確。

中國，不是不可以愛。殖民者曾經多麼地防備你去愛它，連鴉片戰爭都一筆帶過。但是中國值得香港人去瞭解、去愛的，是它的法官還是它的囚犯？是軍隊還是人民？是唐詩宋詞還是黨國機器？是它的大地還是它的官僚？香港如果要對中國做出真正重大的歷史貢獻，是去順從它還是去督促它？公民教育該教孩子的，恐怕不是愛什麼，而是怎麼愛，如何選擇所愛。

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老師們帶著孩子

去行香港的山，教他們認識島上的野花野鳥；是讓維園阿伯成群結隊地去開社區大會，辯論灣仔要不要**Mega Tower**；是讓大學生在做了中區警署的歷史訪查之後，組隊到政府大樓去示威抗議；是讓中學生學習關懷尼泊爾和印度裔香港人的悲苦和孤獨，讓社區媽媽們組織「濕地保護協會」、「石澳文史工作室」、「古蹟之友基金會」。。。

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下一代清清朗朗以自己腳踩的土地和文化為榮。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孩子們知道，當你不同意一個政府的思維和決策時，你如何站出來挑戰它、打敗它。

如果讓假的公民教育生根，令人擔心的是，香港人還沒來得及從前面一堆廢紙堆裡找出祖母的日記，已經被後面轟隆傾倒下來的新的紙堆撲倒。

所謂脫離殖民，意味著被殖民者開始認真地尋找自己、認識自己、發現自己、疼愛自己。每一次遊行，每一次辯論，每一場抗爭，都會使「我是什麼人」的困惑變得清澈。每一棟老屋被保存，每一株老樹被扶起，每一條老街被細心愛護——即使是貧民街，都會使人們驚喜：原來我的腳所踩的就是我的家、我的島、我的國。要人民愛家愛國嗎？不要花納稅人的錢去製作宣傳吧！你不要拆掉他的老屋老街，不要剷除他的參天老樹，不要拆散他的老街坊，不要賣掉他祖母的日記本，他就會自然地「心繫家國」，歌於斯，哭於斯。

認同，從敢於擁抱自己的歷史和記憶開始，而一萬個政治人物的愛國口號呼喊，不如一支低沈的老歌，一株垂垂老樹，一條黃昏斑駁的老街，給人帶來抵擋不住的眼淚和纏綿的深情。老歌、老樹、老街，代代傳承的集體記憶，就是文化。公民社會，從文化認同開始。

中環價值，無法創造人文底蘊；殖民思維，無法凝聚公民社會。而且，別再告訴我「香港人雖然沒有民主，但是有自由」，因為沒有民主保障的自由是假的自由，它隨時可以被你無法掌握的權力一筆勾消，再說，中區警署若是拆個精光，你能怎麼樣？但是你能怪政府嗎？連小學生都知道：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所以，香港，你往哪裡去？

## 光與熱之必要

這裡所有的批評，都是以偏蓋全的，因為明明已經有這麼多人正在努力，不管是民間還是政府內部：保護海灣的運動，灣仔區議會對灣仔老區的關懷行動，四年前文化委員會成員的點滴心血，牛棚書院、**Project Hong Kong** 和種種社運團體的努力、媒體文化版的持續討論，專欄作家的日日呼籲，甚至民政局所主導的種種文

化論壇。 在在都顯示，香港的公民能量和人文反思有如活火山地殼下的熱氣，在撲撲蠢動。七一遊行，是熱量的凝聚。但是，原有的中環價值和殖民思維堅固巨大如鐵山，七年了，鬆動的，是那麼地少。

我只能把黑人作家James Baldwin的話偷來，送給所有正在艱難地放光放熱的香港朋友們：文化傳承是內聚的，它約束了我；天賦權利是外擴的，把我和所有生命永遠地連結。但沒有人可以只要那天賦權利而不接受他的文化傳承。

(My inheritance was particular, specifically limited and limiting. My birthright was vast, connecting me to all that lives, and to everyone, forever. One cannot claim birthright without accepting the inheritance.)

2004年11月9日

\* 戴望舒是詩人，星島日報副刊編輯，因宣傳抗日而被日人於一九四二年春天監

禁於域多利監獄。

誰的添馬艦  
——我看香港文化主體性  
明報（2006-06-05）

我知道「作客人要有禮貌」。我知道我「不是香港人，所以不懂香港」。我完全承認「你們台灣更糟糕」。所以，講這個題目還真的「我有壓力」，套一句「巴士阿叔」的真情告白。但是，我也相信香港人的開闊，容得了善意的直率。

■ 添馬艦有故事

「添馬艦」這個名詞的來源是什麼？我問了10個香港人，發現10個香港人都不知道。



於是做了些研究。添馬艦，HMSTamar，是英國海軍一艘軍艦，建造在1863年——太平天國鬧得正兇、美國正在打南北戰爭的時候。是一艘3650公噸的三桅運兵船，1897年以後，留駐維多利亞港內，成為駐港海軍的主力艦。在1941年的香港保衛戰中，日軍入侵，英軍退守港島，港府下令炸毀港內所有船隻以免為日軍所用，添馬艦也被炸沉。在一個海軍戰俘的網頁上，我找到那個奉命炸沉添馬艦的士兵的日記：

十二月十一日，海軍忙碌不堪。所有船隻都開往九龍，接駁撤退的部隊……十九點正，上尉下指令要我駛往昂船洲接運傷者。昂船洲已經被連續轟炸了二十四個小時。我運了三個擔架傷者，還有一些勉強能走的傷兵。二十一點，奉命炸沈添馬艦……夜特別黑，一點光都沒有，發射魚雷風險很大……我發射的第一顆魚雷，沒擊中。

在同一頁上，還有一個短訊，作者的祖父當年是添馬艦的水兵。她問的是：「我的祖父一直在添馬艦上，可是最後卻死在里斯本丸的災難中。六十年了，有誰可以告訴我他在添馬艦的生活？」

戰爭結束後，港府打撈添馬艦，一部分撈上來的木板，據說就做了聖約翰座堂的大門。

沉沒水底的戰爭殘骸，竟然轉化為仰望天空的的宗教情操。

一旦知道了「添馬艦」有這樣滲透著血和淚的歷史以後，就很難對添馬艦保持漠然。

但是，為什麼大部分的香港人不知道這些歷史，彷彿不在乎自己的歷史呢？恐怕也不是天生的冷漠，而是因為在殖民教育

中成長；殖民帶來物質成就和現代化，同時也剝奪被殖民者對於歷史的細微敏感和自尊自重。

## ■ 強勢政府，弱勢社會

今天的添馬艦，原來當然是海水，當年的軍艦添馬艦就停泊在這裏。填海之後，就是中環到金鐘海岸線核心區的一塊多出來的空地，以「添馬艦」為名，紀念香港悲壯的烽火歲月。在它「暫時無用」的幾年裏，添馬艦「意外地」成為香港的市民廣場：14,000個人在晴空下圍坐著吃盆菜；5000個人聚在一起泡茶；4000個人在星空下肩靠著肩一起看露天電影。這樣一塊「自由放任」的地，在講究精算的香港絕不可能長久。政府決定在這裏建總部。4.2公頃的地面上，2公頃要闢做「文娛廣場」，另一半要建4棟政府大樓，每一棟大約30到40層高。那到底是多大呢？總建築面積，相當交易廣場第一期和

第二期總和。建築費用？52億。

在剛剛興起的添馬艦的辯論裏，讓一個旁觀者最覺不可思議的就是，這麼重大的、影響城市景觀和生態結構的工程案件，竟然可以如此輕易地「過關」。如果是在紐約，在倫敦，在柏林，在東京，甚至在香港人挺「瞧不起」的台北，曾蔭權所提出的「添馬計劃」有太多問題會讓人大喊「未解決」，要窮追猛打了：

譬如問題一，為什麼政府總部要搬遷？人均辦公空間是否真的「嚴重不足」？它的人均辦公空間「不足」是以什麼標準在衡量？跟其他城市的政府空間做過評比嗎？結果如何？跟民間的人均工作空間相比又如何？這些信息若是空白，它如何證明它的空間「不足」？

譬如問題二，假定數據證明空間確實「不足」，那麼高科技電訊溝通系統是否

不能補足？當視訊、網絡如此發達而且一天比一天發達的時候，傳統的所謂「辦公空間」的需求是否應該有全新的定義？是否做過調查研究？是否充分舉證了科技亦無法補足空間需求？

譬如問題三，假定人均辦公空間的「不足」有了科學的證明，那麼究竟應該繼續租用私人商業空間，還是擴大原有政府設施，還是乾脆遷址新建，針對各種選項是否做過徹底的分析比較？3種選項的經濟效應、環境影響、永續發展的評估等等，是否可以攤開在陽光下供學界挑戰，請媒體監督，讓社會檢驗？

譬如問題四，假定前述分析比較的結果確實是遷址新建為優，那麼，哪一個地址最為適合？為什麼不是亟需建設的九龍東南？為什麼不是資源分配偏低需要關懷挹注的新界？為什麼不是使用率低得離奇的數碼港？為什麼不是廢棄已久的西環屠

房？為什麼一定得是添馬艦？科學的理據和說服在哪裏？

譬如問題五，如果政府總部決定落在添馬艦，那麼九龍東南的規劃是什麼？那政府山古蹟群的未來是什麼？那麼新填海中環濱海長廊的具體規劃跟添馬艦之間的呼應關係是什麼？那麼西九龍又將如何？西環屠房要作何處理？

從政府已經披露的資訊來看，這些根本問題都沒有「一個蘿蔔一個坑」的答案，但是52億的款項，立法會幾乎沒有異議。各黨派，除了公民黨，很快就不說話了。少數民間團體，只能要求政府在廠商提出標書之後，把模型拿出來展覽。政府既不需要回答對根本問題的追究——因為反正也沒什麼人在追究；也不必做任何白紙黑字的承諾。答應展出招標事後的模型，還強調這是「破例」，而且人民不能給意見，政府已經給人民很大「面子」，

做了「讓步」了。

香港政府真的強勢有為。民間，也真溫順得可以。

## ■ 挖土機你為什麼這麼急？

我無意說，政府強勢一定不好。很多政府可能對香港政府充滿羨慕：預算超高（香港政府預算是台北的8倍），主導性超強，社會力超弱。強勢政府尤其喜歡在工程上展現魄力，因為工程是最容易看得見的政績。

香港政府的「勵精圖治」企圖是很明顯的：政府剛剛公布了中環新海濱規劃方案，宣稱要「締造令人嚮往的消閒休憩用地及海港和商業中心」，要「發展成為象徵香港的世界級海濱」。天星碼頭旁將興

建3組商廈建築群，包括28層高的商廈、18層高的「無敵海景酒店」，以及9層高但是長400多米的「摩地大廈」。除了這「世界級海濱」之外，西九龍40公頃的工程在規劃推動中；添馬艦將有政府大樓群等等，還不必談及大嶼山的開發以及各種跨界大橋的規劃。

政府強勢不一定不好，但是，當我們面對一個「勵精圖治」的政府時，當強勢政府像一個巨大的挖土機在橫衝直撞時，社會不能沒有一個深思的心靈和長遠宏觀的眼睛。我們可能必須在轟隆作響、天翻地覆的挖土機前，放上一朵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

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提醒的是：

城市規劃是牽一髮動全身的。

以維多利亞港來說，中環濱海長廊的建



築，勢必整個改變「香港的臉」——舉世聞名的浪漫維港景觀。想像你站到水中央，往維港四周緩緩做360度的觀覽，從西九、尖沙嘴、尖東、銅鑼灣、金鐘、中環、上環，一路流轉回到西九，維港的整體景觀，色彩、光影、山脊線與天際線的交錯，海港與建築風格之間的相輔相成諧調之美，是否有整體的預想呢？或者還是讓每一個海濱工程孤立的、局部的、偶然性依一時一刻之需而發展？

政府山的古蹟群，是香港唯一的一片完整殖民建築風格了，曾蔭權無論如何不願承諾保護，這些古蹟若是有一天剷除了，又變成以金錢計算平方呎的地產價值，香港人能夠忍受這樣對待自己的歷史嗎？如果保留了，添馬艦52億的大洞，你又如何填補？

如果這一切都還沒想好——那麼，挖土機啊，你究竟為什麼這麼急？

## ■ 香港跟誰比？

當主事者總是用「世界級」、「地標」、「香港精神」來描繪自己的「勵精圖治」的企圖時，我們能不能聽見一個小小的、安靜的聲音說，為什麼香港需要「地標」？「世界級」是跟誰比？比甚麼？「香港精神」又是什麼？

西班牙的畢爾包怎麼能拿來跟香港比呢？畢爾包需要Frank Gehry的古根漢美術館作為地標，因為畢爾包是個極其普通的不起眼的小城，它可以用一個標新立異的特殊建築作為地標來突出自己。香港卻是一片璀璨，地標如雲，當地標被地標淹沒的時候，你還看得見地標嗎？地標還有意義嗎？

如果說，像畢爾包這種只有常民生活而缺特色建築的城市需要現代建築來作為地標，那麼地標簇擁的香港所需要的，反而是常民生活的沉澱，小街小巷老市場的珍愛呵護，讓「市井人文感」更醇厚更馥郁，而根本不是高大奇偉的所謂「地標」。

至於「世界級」，又是跟誰比呢？又是紐約倫敦巴黎柏林之流吧？問題一，為什麼要跟她們比？香港的基礎建設，比她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

問題二，就是要比，香港要跟這些城市比「世界級」的，仍舊是硬體工程嗎？什麼時候，你終於要開始跟人家比「內涵」呢？為什麼不去和巴黎倫敦的古蹟、老

街、舊磨坊、人文薈萃的河左岸、車庫廠房裏的藝術村去比「世界級」呢？

然後，代表「香港精神」的，仍舊是「無敵海景」的酒店？仍舊是已經滿城皆是的購物商廈？這種意涵的「香港精神」，又是「誰」下的定義呢？地產商？還是灣仔、西環、屯門、大埔、深水土步的人民？

## ■ 一個謙抑樸素的政府

添馬艦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燈光一亮起，香港的嫵媚姿態光彩動人。請問，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擺到舞台上去嗎？

封建時代，貴族以金錢和絕對的權力打造宮殿，宮殿成為城市的中心。在一個現

代社會裏，政府是服務市民的「公僕」——它是人民的庫房、機房、廚房、帳房、屠房，也就是一個**service quarter**，服務區。誰會把服務區放到舞台上面去？誰會把庫房機房帳房廚房屠房，放到一棟房子最重要的前廳去呢？

城市走多了的人，有一個指標：一個城市政府大樓如果富麗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這個城市是個政權獨大的體制。如果主權在民，公民力量強大，政府大樓通常建得謙抑樸素，緊守「公僕」服務的本分而不敢做權力的張揚。紐約的市政府、柏林的市政府、倫敦的市政府，我們知道在哪裏嗎？他們佔據城市的核心舞台嗎？

所以，嘿，把政府總部遷到西環屠房如何？屠房適合政府的「公僕」地位，而老舊的西環也非常需要社區振興，不是嗎？

中環最突兀的，是解放軍大樓。把軍隊擺在香港面向世界最燦亮的舞台中心，等於是把兵器倉庫放到客廳裏去了，你能想像巴黎把軍隊駐在羅浮宮旁嗎？從前英國人這樣做，是為了炫耀它的殖民權力—企圖之囂張，不言而喻；今天，還有這必要嗎？景觀上不倫不類暫且不說，它所透露的粗暴意涵，更是招引負面解讀。曾蔭權政府最該做的，是設法把解放軍從中環遷走，把海濱還給人民。這不去努力，卻反而更將政府大樓擺到添馬艦去，說是創造一個「市民精神地標」(**iconic civic core**)。

在很多其他城市，公民恐怕早已「磨刀霍霍」上街抗議了。在一個公民社會裏，代表一個城市的「精神」的，絕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大樓。它可能是歌劇院，譬如悉尼；可能是博物館，譬如巴黎；可能是藝術家出沒的村子，譬如紐約；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廟老樹，譬如京都；可能是

一條滄桑斑駁的老橋，譬如布拉格。但是，什麼樣的城市，會把市政府——一種權力機構，或服務區，當作精神標誌？

中環的維港是全世界看見的香港面貌，那面貌，真的是風情萬種。香港希望讓世界看見的，難道是市政府大樓？

把政府大樓放在添馬艦，怎麼看，都讓人覺得有一種權力的不知謙抑，不知收斂。

## ■ 真正的「香港精神」

更符合「香港精神」的，恐怕反倒是一萬多個市民在晴空下圍坐吃盆菜，反倒是5000個人開心泡茶、聽音樂；反倒是4000個人在星空下肩靠著肩看露天電影，一起哭，一起笑。當世界看見的香

港，不只是千篇一律的酒店和商廈，不只是冰冷淡漠的建築，如果世界還看得見香港的「人」－快樂的、悲傷的、泡茶的吃飯的、散步的追風箏的，憤怒示威的、激動落淚的，彼此打氣相互鼓勵的香港的常民生活，也就是一個有生活內涵、有人的性格的城市，那才真的是「世界級」的「香港精神」吧？

衡量社會的進步，錢，不是唯一的指標。一個4公頃的廣場，或許失去了以平方呎計算地產的金錢，可是一個面對全世界的正面的香港形象，能用港幣或美金來計算嗎？市民，因為在廣場「歌於斯，哭於斯」而凝聚出來的深遠文化認同和社群意識，能用一平方呎多少來計算嗎？

2004年11月9日，在同一個地點，我提出對西九龍的質疑。當時有這樣一段話：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



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複，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裏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

兩年過去了，西九龍前途未卜，中環海濱正準備大肆建築，添馬艦箭在弦上，政

府山古蹟群處境堪危，香港的城市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可是，社會裏關心的人卻非常、非常少。兩個月前，我曾問一班大約50個大學生，他們是否知道添馬艦的事情，答覆知道的只有一兩個。

文化主體性，我想並非僅只是政治層面的六四靜坐和七一遊行，香港和北京的精神拔河。關心香港本地的永續發展，關心香港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香港，是更關鍵的文化主體性的意識呈現。但是，政黨的立場搖擺不定，非政府組織的力量零散薄弱，大學生，對社會議題彷彿完全視若無睹，漠不關心。而他畢業後一旦進入政府，成為官僚體系成員，卻開始強勢行政主導。

陳冠中有一篇文章，我覺得是香港人了解自己必讀、外地人了解香港人必讀的，叫做「我這一代香港人」。他是這麼描述現在四五十歲這一代，也就是社會主流

的：

我們整個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什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們愛錢。(註)

「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的思維，或許可以造就眼前的效率成果，但是窒礙了宏觀的、長期的、永續的思考。「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的順民習慣，或許可以贏得個人的事業領先，但是犧牲了社會整體的進步。

我不懷疑曾蔭權的愛港之心，但是他的

決策可能是錯的，龍應台的意見更可能是錯的，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公民以香港為家，對香港負責，這，才是「文化主體性」，才是「香港精神」吧。

(2006年6月2日於香港大學的演講)

西九龍：為誰而建？

香港政府不僅只將充滿歷史記憶的老區交給財團去開發，空曠的新地同樣放任財團去發展。西九龍簡直就可以直接寫進文化政策的教科書當作負面教材範例。香港核心區最後一塊濱海的鑽石地帶，如果

講明要做商業開發，靠賣地賺錢，也就罷了，可是政府說，這將是文化項目，要有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廳等等，要在文化上建設香港。

要建設一個文化的香港，是不是先要知道香港有甚麼，缺甚麼，哪裏強，哪裏弱？在招標之前，起碼有幾十個非做不可的研究調查：

譬如藝術教育整體研究：香港的教育制度裡有多少藝術教育？與國際評比如何？藝術教育，缺哪一環？香港人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有怎樣的文化素養？西九龍規劃需不需要把青少年的藝術，教育當作核心思考？

譬如創意產業調查分析：哪一個產業在香港最具競爭力，最值得重點扶植？如何扶植？動畫是否已被韓國領先？水墨是否有發展空間？設計是否是香港的優勢？如果是，應該設立博物館還是設計學院還是兩者都不要？

譬如藝術人才培養計劃：除了補助以

外，是否應該有制度的變革？是否應該提升智慧財產的保護、是否應該加強大學的藝術科系，西九龍如何用來培養本土創作……

譬如欣賞人口的擴展：十八歲以下的藝術欣賞人口有多少？甚麼獎勵或補助制度可以創造，欣賞人口？甚麼設施可以吸引更多年輕的藝術欣賞者？

譬如弱勢公民文化權的普查：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看甚麼戲、聽甚麼歌、享用到幾成的文化設施？盲者、聾人、單親媽媽、同性戀者、坐輪椅的，精神病患、監獄犯人、外籍勞工、尼泊爾和巴基斯坦的弱勢族群、貧窮線下的赤貧者、赤貧者的孩子……享用到多少文化的公共資源？康文署所提供的活動裡他們的參與是幾成？如果弱勢者的文化權沒有被照顧到，那麼西九龍是否應該將之納入考量？

譬如現有文化設施的全面體檢：歷史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等等，現有多少參觀人數？藝術教育效應評估如何？是否

低度使用？是否浪費空間？是否經營不善？是否資源重疊？

譬如二零二零年香港文化發展藍圖的提出：香港對自己的文化期許、文化定位是甚麼？它所缺的究竟是草根性質的社區兒童圖書館、街坊藝文活動中心，還是水晶燈紅地毯、一張椅子一萬塊的現代演藝廳？要補強的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現代的還是傳統的、本土的還是國際的？

譬如……

零零星星的研究確實在進行中，但是並沒有整體的藍圖。好像掛一張巨大的文化地圖在牆上，將宏觀的未來藍圖透明疊在現存狀態上，就可以清楚看見自己的強項和弱點。西九龍應該發揮甚麼功能，應該包含甚麼設施，應該或不應該做甚麼，必須放在這樣一個宏觀、前瞻的藍圖上去思索，才是負責任的規劃。

沒有全面的研究調查，沒有宏觀的文化藍圖，也渾然不談香港的文化定位，就把西九龍交給財團去自由發揮。財團怎麼做

呢？他關心香港的藝術發展嗎？他瞭解香港的文化潛能和文化困境嗎？他有文化的前瞻能力嗎？他對邊緣人、小市民的文化公民權要負起責任嗎？

西九龍落在商人手裡，於是我們就看見典型的香港商業操作上演：一個說，邀了龐畢度來 開分店，另一個就說要與古根漢合作，第三個更厲害，找來了「八國聯館」，號稱要聯合北京 的故宮、芝加哥美術館、俄羅斯埃爾米塔日故宮博物館、羅浮宮和奧塞、澳洲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及亞伯特美術館、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西班牙普拉多美術館。商人玩藝術家、建築師、美術館的名字跟他們玩 **Gucci** 皮包、**Bali** 皮鞋、**Armani** 服飾、**Dior** 化妝品手法一樣，只是文化的意義被淘空。

有沒有人問：這些聲名顯赫的國際美術館進到西九龍，為香港人帶來甚麼？香港的孩子，會得到更好的藝術教育？本地的藝術家會得到更多發表的空間、創作的



資源？香港文化會從此紮根，香港人會因而對香港文化更有自信？還是說，香港因此會吸引法國人來香港看羅浮宮和 奧塞分店，吸引美國人來香港看古根漢分館，吸引俄羅斯人、加拿大人、西班牙人來香港看他們國家的東西，或者北京人來香港看故宮典藏？

西九龍究竟是為甚麼而建？為誰而建？更核心的是：香港的文化藍圖究竟是甚麼？人文素養的厚植、文化發展的永續，策略又是甚麼？如果對人文有關懷，對未來有擔當，這些問題都是決策者不能逃避的問題。

但你不能對商人這樣要求；商人是為了賺錢發財而存在，政府才是為了關懷和擔當而在。對香港的孩子、藝術家、文化發展、城市前途有責任的，不是這些商人，是政府。當政府沒有關懷和擔當時，那就是一個有問題政府。

沙灣徑25號

我獨獨看不到香港

一壺酒下來，有那為新時代新氣象昂揚奮發的，也有那不勝欷歔的，欷歔的內容也差不多：以為統一會帶來幸福，發現它同時帶來自己被「併吞」的屈辱。

柏林圍牆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被人們踩在腳下，兩德統一的步驟緊接著一一開展。東馬克變成西馬克；斷了四十年的地鐵鐵軌重新接上；歷史教科書重寫重學；地理地圖重畫重印；國旗國歌國名換了版本；銅像撤下，用吊車移走。共產黨的領導層固然瓦解，常任文官的意識形態和個人歷史也受到檢驗，「不適任」的就被換掉；各種行業裡大大小小的主管位置，大致換了人做。牆上的標語或者被工人洗掉或者被風雨漂白，電視上的廣告換了一套語言。在天翻地覆的過程中，歷史的陣痛最尖銳的還是軍人的那一幕：東德

的武器成噸地銷毀掩埋，而軍人，很多人自願或被迫離職轉業，那留下的，脫掉身上的戎裝，摘掉肩上的徽章，穿上四十年來都是敵人的制服，面對不同的肖像和國旗，換一套誓詞，敬禮。

讀十七世紀中晚明文人如何在滿清入關時凜然求死，讀二十世紀初清朝遺老如何在窮途末路中尋找尊嚴，我可沒想像過在自己所處的現代裡，也會目睹「改朝換代」。二十世紀兩個重大的分水嶺：一九四九年前後我的父執輩經歷了朝代的更迭，一九八九年前後則是我這一代人目擊時代的斷裂和顛覆。擺出一張桌子一壺酒，放上幾張凳子，讓一個莫斯科人、柏林人、華沙人、奈洛比人、巴勒斯坦人、尼加拉瓜人、北京人、台北人圍上一圈坐下來，若是談改朝換代的價值翻轉和身份認同的迷失困惑，恐怕不需翻譯，因為雖然版本不同，所有關鍵的詞彙卻都一樣。

版本不同，因為有的是從異族的殖民統治轉換成獨立自治，有的是從異族的殖民

統治轉換成同族的「內在殖民」，有的是從專制獨裁轉換成民主體制，有的是在專制獨裁裡頭老是換人做獨裁。有的是人民用鮮血爭取來的轉換，有的是用人民的鮮血奪取來的轉換。有的是和平轉移，有的是槍聲鎮壓，沒有表面的轉移卻有隱藏的路線變更。版本有異，但是關鍵詞彙是近似的：歷史翻案，舊帳清算，愛國的新定義，遊戲規則的翻轉，鞏固權力的方法，意識形態的塑造……。

一壺酒下來，有那為新時代新氣象昂揚奮發的，也有那不勝欷歔的，欷歔的內容也差不多：以為統一會帶來幸福，發現它同時帶來自己被「併吞」的屈辱。以為獨立會帶來平等，發現獨立後的鬥爭殺伐比前朝更為殘酷。以為脫離異族統治會帶來民族尊嚴，發現同族的統治一樣地居高臨下，只是因為同文同種所以手段更嫻熟。以為民主會帶來自由，發現民主也有可能比專制更霸道。以為反對黨變成執政黨會帶來改革，發現反對黨比你推翻的人更

無能、更專權而且更理直氣壯地無能、專權，因為它是被選上去的，它認為你早已授權，咎由自取。以為知識份子最是清醒，發現權勢照樣使他變臉。以為「暴政必亡」、「多行不義必自斃」，發現「暴政」也可以與資本主義結合而腐肉重生。

十月份走在香港街頭，細心的你會有所發現。曾經處處可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十月十日這一天，已經看不見了。酒會，也一年比一年冷落。十月一日卻變成一個輝煌重要的日子。走過一個小學，學校圍牆上貼滿了孩子稚嫩的作品：山河壯麗，祖國偉大，楊利偉上太空是中國之光，金牌運動員是民族的榮耀，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文明燦爛。孩子們畫彩色的龍，雄壯的長城，永恆的長江，美麗的故宮。顯然是「公民教育」的一部份。

在這些童稚的畫中，看不到灣仔擁擠的市場，看不到上環層層疊疊的老街窄巷，看不到大埔的漁村也看不到沙灣徑淒美的夕照。在香港孩子們的想像和讚頌中，為

什麼我獨獨看不到香港。

■沙灣徑25號

歷史還沒過去

龍應台 (20050304)

十五歲的孩子在香港的德國瑞士國際學校上學，每天搭乘印著「德瑞學校」校名的專車上下學。德瑞學校的德語學生其實主要來自三個國家：奧地利、瑞士、德國。「今天又發生了。」一進門他就說，放下了書包。

他說的是，德瑞校車和一輛英國學校的校車在半山上擦身而過。英國學生在車內一看見德瑞校車，就全體高舉起右手，對著德瑞學生大喊：「嗨，希特勒！」然後就東歪西倒地大笑。

「那你們怎麼反應？」我問他。

「同學都很氣啊。」他邊脫球鞋邊說，「可是也沒辦法。車子一下就過去了。」

如果不是「車子一下就過去」，我知道，少年們有群架要打了。在赤柱的足球場上，在淺水灣的沙灘上，孩子說，有些英國學生只要看見是講德語的人，就會把手舉起來，發出挑釁的喊叫。有些德國學生就會一邊怒罵，「媽的，希特勒跟我有什麼關係」，一邊生氣開始追逐。

「有一次，在麥當勞，」華飛說，「兩個英國學生，聽見我和一個朋友說德語，就把手舉起來，衝著我們喊『嗨希特勒』。我們就走過去，說，『你們是什麼意思？』」

「他們呢？」

「他們大概以為我們要打架，就趕快說『對不起』。跑走了。」

「為什麼，」晚餐桌上，我的少年問我，「都已經六十年了，歷史好像還沒有過去？」

那是二〇〇五年二月十三日。星期天，所以我們有充分的時間談我們個別讀到的文章。當天國際新聞有一個焦點：二

月十三日是德瑞斯登大轟炸六十週年，德國右翼份子將在德瑞斯登舉行大遊行，紀念被盟軍炸死的亡魂，也企圖利用古城的悲情，塑造德國是「受害者」的形象，以爭取選票。德國政府則擔憂右翼勢力的崛起和擴張，步步為營地試圖防堵。

一九四一年，英國空軍有人建議，要用地毯式轟炸來摧毀德國的城鎮，才能真正斷折德國的戰鬥士氣。這是一種「恐怖戰」，在一九四二年正式成為對德作戰策略。英美盟軍用的是一種「暴雷火」攻擊；飛機對準大城市拋下大量填滿高燃度化學品的「火彈」。當城市陷入火海時，著火區上方溫度快速升高，而地面層的冷空氣迅速侵入，人，便像油煙被抽風機吸入一樣，被抽入火海。

一九四五年，文化古城德瑞斯登被選中了，城內除了原有的六十五萬人口之外，還有幾十萬難民的聚集。在德國投降前三個月，德瑞斯登被密集轟炸了整整兩天，死亡人數究竟是三萬五千還是十萬



人，歷史學家到今天也說不清。

對德瑞斯登的轟炸屠殺，是不是一種「戰爭罪行」呢？英美盟軍是不是該受譴責呢？德瑞斯登的市民，有沒有權利為自己受難的親人哀傷或憤怒呢？憤怒的對象，是始作俑者的德國自己，還是丟下「火彈」的英美聯軍呢？如果是對自己，六十年的懺悔和自我鞭答夠不夠呢？如果是英美，那麼被德國飛機所炸死的人——蘇聯就有五十萬人因德機轟炸而死，又該對誰憤怒？如果德瑞斯登的轟炸是一種罪行，那麼廣島和長崎要怎麼看呢？如果全世界都要德國為歷史賠償賠罪，那麼日本又以什麼標準可以被容許不賠償賠罪呢？

二月十三日當天，德瑞斯登出現了三股人潮：上千的市民別上了白玫瑰，默哀死者，祈禱和平。右翼份子遊行，要英美承認錯誤。左翼份子聚集，反制右翼份子，圍堵新納粹主義的再生。每一股人群，都在試圖掌握歷史的解釋權，因為歷史怎麼解釋，決定了權力的去處，也決定

了未來的日子怎麼過。

「當我們這一代變成總統和總理的時候，」華飛說，一口咬下脆脆的春捲，「不知道會怎麼解釋德瑞斯登。」

那可能是二〇四五年，少年五十五歲的時候；但我已經看見，歷史仍沒完。